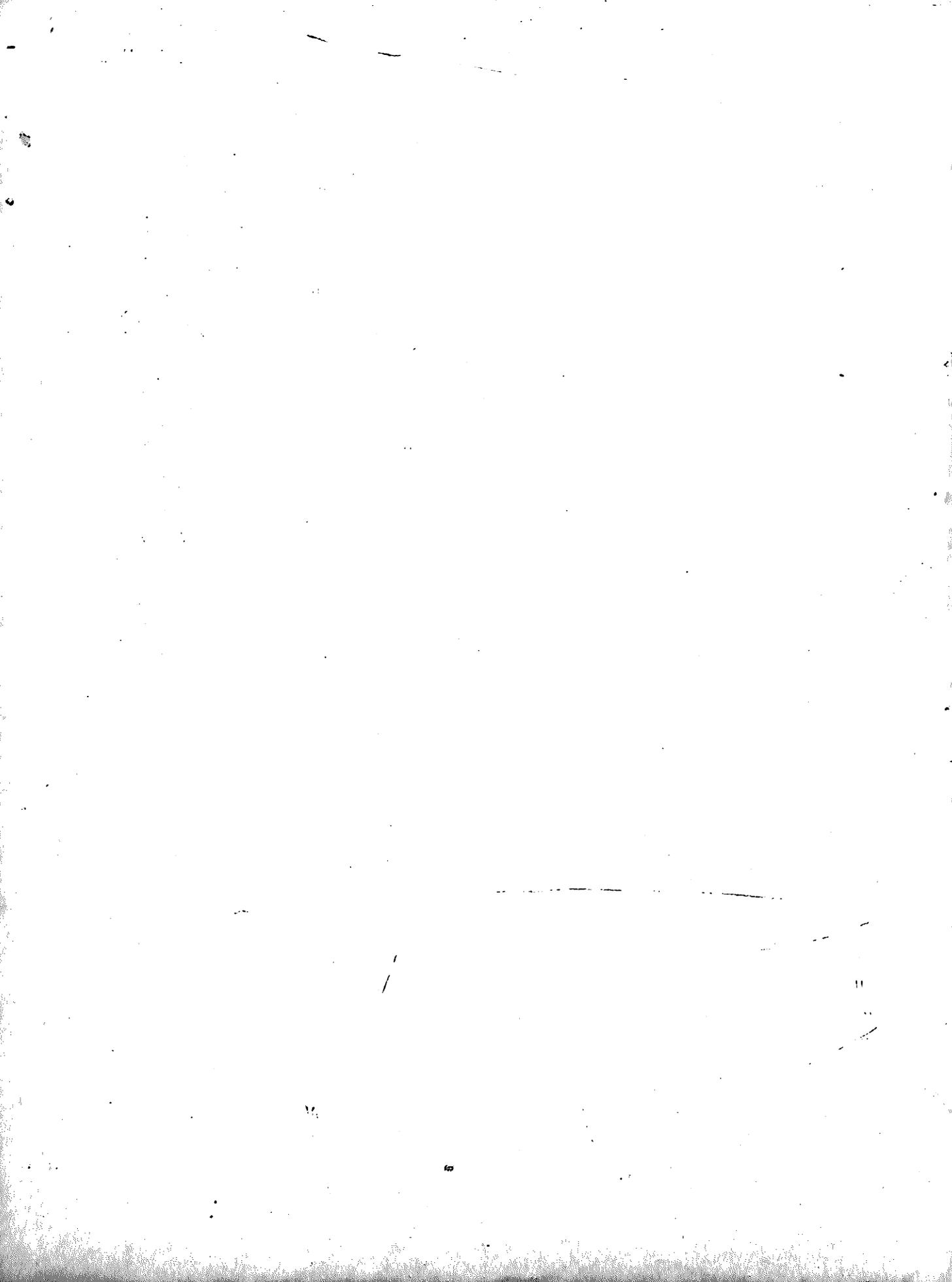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柳青
1976.2.24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目 录

词二首 毛泽东 (3)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方海 (5)

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罗思鼎 (8)

对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判

——上海手套行业四次革新的调查 巩学庆 (14)

革命促进了农业的高产

——嘉定县徐行公社调查 (16)

杂文：树木和树人 乐英 (19)

加强党的领导 开展教育战线的大辩论

学习康生同志的继续革命精神.....复旦大学 唐 文 (20)

开门办学好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组 (24)

教育革命的成果不容抹煞

——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教学队的调查徐 瑩 王之璋 (2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谷超豪 (31)

新花朵朵春满园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展览会巡礼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师 陆士清 学员 张晓林 (35)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反修防修的壮丽诗篇

——青年工人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笔谈 (43)

革命能改变一切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杜华章 (47)

壮志凌云霄 凯歌响天外

——毛主席诗词演唱会抒感石 川 (52)

近代史研究

抗日英雄杨靖宇.....上港三区青年工人 凌永康
上港五区青年工人 傅正宇 (55)

汪精卫卖国记(中)史 锋 (66)

社 会 调 查

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

——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 (75)

◀ 一月四日付印
一月十四日出版 ▶

词 二 首

舒东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风雷动，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原载《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方 海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是，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阶级斗争这个纲紧紧地抓在手里。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要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刘少奇、林彪一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各个历史关键时刻阶级斗争的情况和苏联的历史教训，就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一九五六年，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胜利地执行。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醒全党要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刘少奇一伙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背着毛主席把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塞进八大决议。按照他们的谬论，那就是社会

主义革命搞得太快了，应该停下革命去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要倒退到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刘少奇在教育界极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智育第一”。他们打出“向科学进军”的旗号，引诱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林彪、陈伯达继续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提出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继续鼓吹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搞什么电子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绝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战线上，他们鼓吹什么“我们的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公然为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否定正在发展的教育革命。

再看一看苏联的历史教训。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紧接着在二十年代开展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列宁在当时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苏联当时直接从工农中招收学生，注意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战线上出现了一大批新生事物。到了三十年代，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这时，窃取了苏联教育界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接过实现国民经济技术现代化和加速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革命口号，对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攻击教育革命造成了学校“混乱”，学生“知识水平低下”，进而复辟了旧的教育制度、招生考试制度。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苏联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是这个“家”、那个“家”一类的精神贵族。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沦落成为法西斯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历史的教训对我们真是太深刻了！

今天，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四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有的人不谈党的基本路线，不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公开诬蔑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怪论的出现是值得革命的人们深思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

的一条重要战线。资产阶级要用教育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无产阶级则要用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资产阶级总是要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来鼓吹“智育第一”，即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智育第一”，就是唯生产力论在教育界的表现。凡是搞修正主义的，搞唯生产力论的，搞技术挂帅的，搞“智育第一”的，都是阉割掉无产阶级专政，抽掉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但是，这一定要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靠广大群众去搞，依靠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去搞。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行的。我们的教育革命，就是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新部队。实践证明，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学员德智体全面发展，扎根于群众之中，他们同工农群众紧密结合，就能担负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任，而决不是什么实行教育革命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差，“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鼓吹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人，就是妄图从教育界打开缺口，从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党的基本路线。他们之所以要在四个现代化和教育革命上大做文章，其险恶的用心就是要利用人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来腐蚀人们的灵魂，引诱人们离开无产阶级政治单纯地去发展经济，这只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打掩护。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真正认识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不搞清楚或者忘记了这一点，就会走到斜路上去。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智育第一”来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将会反复出现。因此，我们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的这种进攻。我们不论是搞经济，办教育，搞科研，或从事其它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要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胜利。

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罗 思 鼎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武训传》批判，是解放后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投降主义的第一仗。毛主席十分重视这场斗争，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毛主席在这篇社论的一开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这里说的根本的性质，指的就是影片歌颂了武训的投降主义路线，否定了农民革命的路线。对《水浒》和宋江的吹捧，是属于同样性质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时期，鼓吹投降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在国外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不应该去歌颂投降派，不应该承认或容忍对投降主义的歌颂。

解放二十多年来，投降主义思潮总是不断地冒了出来，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停止过。在建国初期，毛主席批判了《武训传》和鼓吹卖国主义的《清官秘史》。一九五四年又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判了压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事件。一九五七年，党内的右派分子首先敲起《电影的锣鼓》——投降主义的

锣鼓，配合国际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授意炮制《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翻案。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投降派。当前正在开展的《水浒》评论，同样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毛主席领导的每一次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社会主义时期，投降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为了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鼓吹向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投降的思想。刘少奇、林彪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大的投降派。他们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理论上必然狂热地鼓吹阶级调和论，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投降主义思潮，既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又是为这条反动路线推波助澜的。刘少奇、林彪是投降主义思潮的总后台。

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投降派和投降主义，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背景，是反革命阶级政策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最害怕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总是竭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妄图模糊革命人民的阶级意识，磨灭革命人民的斗争锋芒，引诱和收买革命的败类。刘少奇、林彪这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在革命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发生动摇、妥协和投降。林彪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刘少奇叛变投敌，当了可耻叛徒。当革命胜利发展时，他们又迎合了反动派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和平演变的策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从内部瓦解和葬送革命。

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投降主义路线，都是在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文章中，在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时提醒全党：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时，“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

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可见，投降主义在革命不利时或革命胜利发展时都有可能出现，而在后一种形势下出现的投降主义危害更大。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以《武训传》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思潮，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形势下出现的。当时，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投降主义政治纲领，妄图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后，刘少奇炮制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林彪、陈伯达又抛出反革命的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一次鼓吹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投降。这种在胜利形势下出现投降主义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投降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总是与阶级斗争的起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发展，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也越深刻。象武训那样公开的投降派，站在革命队伍外面来反对革命，还比较容易识别，欺骗性也较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就有越来越大的危险性。宋江与武训不同，他钻到革命队伍内部篡夺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具有修正主义的特征。他在梁山起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把一支农民革命队伍改造成为封建王朝的御林军，起到了反革命暴力所起不到的作用。批判投降派宋江，有助于我们认识修正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因此，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了投降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围绕着《武训传》而展开的讨论，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武训传》的吹捧者却要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新跪倒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老路。当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投降主义的批判，则是将无产

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斗争。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决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始终坚持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因此，我们必须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形形色色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种已经批判过了的投降主义思潮常会重新登台。反对投降主义，并不是经过几次、十几次大的斗争，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在革命还是投降、前进还是倒退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当一种投降主义思潮潮水般涌来时，我们必须以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进行抵制和斗争，从《武训传》批判到《水浒》评论，每一次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总有人感到不舒服。因此，在今天重提《武训传》吹捧者的错误，并不是没有教益的。

在《武训传》批判中，毛主席针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猖狂进攻和文化界出现的严重思想混乱，曾严厉斥责了那些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种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教训，是我们应该永远引以为戒的。当然，投降主义思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往往披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甚至打出革命的旗号，欺骗群众，给认识其真相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投降主义思潮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识别和批判了一种投降主义，并不意味着能识别、批判一切投降主义。有的人在批判一

种投降主义时，不愧为勇敢的斗士，当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投降主义思潮时，却又成了俘虏。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这就向每一个革命战士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革命队伍中的有些人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些人中，有些是被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的同路人，当革命步步深入时，他们就想“到站下车”了。也有一些人，经不起反动派的欺骗引诱和糖弹的袭击，最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堕落成为投降派。还有一些人，由于不能坚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能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修正主义缺乏识别能力。他们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头脑里保存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因此当出现投降主义思潮时，就一拍即合。可见，如果在思想上当了俘虏，最后在政治上也必然成为俘虏，这中间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

毛主席在《武训传》批判中，还从两种历史观的高度精辟地剖析了《武训传》吹捧者在思想上的根本错误，论证了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这里彻底揭露了《武训传》及其歌颂者的根本错误，是用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长期以来，在《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没有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因而划不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错误路线辩护。《武训传》和《水浒》，都是以

阶级调和论为思想基础的。《水浒》研究中各种错误观点的存在，证明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阵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落实。因此，《水浒》评论要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特别要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是又一种形式的投降主义思潮。搞投降主义的人，他们总是要维护和复辟腐朽的旧事物，反对和阻挡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成长。宋江反对梁山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这个新生事物；武训否定和反对反帝反封建农民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新生事物。在今天，形形色色的反对新生事物，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教育战线刮的右倾翻案风，同解放以来历次投降主义思潮一样，是社会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党的九大、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但是，总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否定这场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向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投降，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教育战线的这场大辩论，又一次证明了批判投降主义思潮的必要性。

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投降主义思潮就不会销声匿迹。我们党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党批判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的投降主义，推进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又批判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 展。每当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毛主席总是提醒我们要警惕出现投降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从《武训传》批判到《水浒》评论，二十多年斗争的反复和曲折，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地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将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对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判

——上海手套行业四次革新的调查

巩学庆

上海的机织手套行业，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在一九五八年前的三十多年中，手套生产使用的设备，是仿造二十年代国外引进的手摇横机。工人操作时，手摇，脚跳，口数，脑记，全身动。许多工人在长年累月笨重劳动的折腾下，被弄得“肩膀有高低，手臂有粗细”。可是现在，你走进一些手套工厂看一看就会发现，程序控制箱上的指示灯在一眨一眨地闪亮，几十台横机动作整齐地自动运转，车间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人……

上海手套行业生产技术面貌发生的变化，经过四次重大的革新。第一、二次革新，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实现的，甩掉了“手摇柄”和“套针板”，实现了电动化和半自动化。第三、四次革新，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实现的，把半自动化的手套机搞成了自动化，采用了电子技术，有的还实现了电子群控。手套生产水平来了一个大飞跃：全行业人员减少三分之二，产量翻了近四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十六倍。

上海手套行业四次革新的实现和生产水平的飞跃，雄辩地证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对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的唯生产力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毛主席指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如此。”整个社会是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这样。为什么落后的手摇横机，长期以来连一只螺丝都没有改动？在旧社会，资本家掌管工厂的一切，工人连饭都吃不饱，当然谈不上搞革新。解放以后，工人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建国初期的上海手套行业，许多工厂的生产资料还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到一九五六年，全行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的胜利，紧接着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斗争的胜利，才出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局面。手套行业第一、二次技术革新的丰硕成果，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灿烂之花结出来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能一门心思抓生产、抓技术革新吗？还是不能。手套机械虽然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两次大的革新，但是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由于当时有些手套工厂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工人的积极性还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有的工厂不准广大工人七手八脚地搞革新，只准少数人关起门来冷冷清清地搞。工人搞出了样机，还被斥之为“不正规”，“不科学”。总之，尽管工人想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却不能得到发展。那时，刘少奇、陈伯

达竭力鼓吹唯生产力论，而真正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正是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一九五八年往后的几年内，手套行业的技术革新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手套行业的工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唯生产力论，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生产的自觉性，技术革新之花开满了各个手套工厂。作为上层建筑的上级领导机关，努力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全行业的技术革新组织了协作会战，集中了技术革新的主攻方向。同时，上海有关高等院校的大批工农兵学员到工厂开门办学，也促进了手套行业技术革新的进一步开展。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短短的四、五年内，手套行业又闹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新，在全行业内推广了八百多台自动手套机，实现了全行业的单机自动化，并且采用了先进的电子技术，又把手套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上海手套行业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搞起来的。这就说明，“抓革命，促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只有抓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了生产关系的调整，才能充分调动工人和革命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有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才能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上海手套行业刚试制出第一台电子群控设备时，电子神秘论还是很有市场的。再加上第一台新设备还不那么完善，一股冷风就刮了过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批判了复辟倒退的错误思潮，批判了天才史观和电子神秘论，才顶住了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冷风。手套行业各个工厂的工人相互支持，同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只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创造出一条群控二十八台尼龙花色手套机的自动线和一条群控二十台一步法手套机的奇迹。

手套行业的发展经过四次革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生产并没有到顶，技术革新项目也并不已经十分完善，例如用电子技术的群控手套机，还不适应多品种多花色生产的需要。现在手套行业广大干部和工人正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坚定不移地从不断改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着手，促使电子技术的应用更加完善，把手套生产不断提高到更新的水平。

手套行业实现四次重大革新走过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它生动地说明，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矛盾要不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伟大力量。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生产抓生产，就技术抓技术，就会滑到斜路上去。因此，必须时刻警惕唯生产力论作怪，警惕有的人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搞折衷主义。手套行业的同志们说得好：我们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一定又要坚持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这里，包含了他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深刻总结，也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永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革命促进了农业的高产

——嘉定县徐行公社调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嘉定县徐行公社广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七五年，在夏熟作物连遭阴雨、秋熟生产病虫害严重的情况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二千零十三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十一，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超过双千斤的公社，棉花亩产达到一百二十一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怎样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就生产抓生产？这不但是关系到能不能迅速发展生产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徐行公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开始学大寨的时候，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只是就生产抓生产，运动进展不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狠批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就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农业生产不断上升，到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时，粮食常年亩产已经超过了“双纲要”，达到一千七八百斤。徐行大队闵西生产队的前后变化，极好地说明了农业生产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不断抓了革命的结果。一九七一年，闵西生产队的队长在一个富农分子的煽动下，热衷于跑自由市场，甚至占用国家的河道水面种植水花生卖高价。队里资本主义歪风泛滥，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后季稻每亩平均只收一百四十多斤，年终分配时，向别的队借了七千元现金和两万斤粮食。但一九七三年，这个生产队在上级帮助下，深入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改选了领导班子，端正了路线，革命生产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一年，后季稻每亩收到八百多斤，成为全大队产量最高的一个队，年终分配时不仅还清了债，还留了四万斤储备粮。徐行公社的同志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联系讨论关于小生产和所有制等专题，广泛发动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批修正主义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原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一些队，有了显著的变化。例如，有个大队的水上运输队，有九条船和三十多个劳动力，长期离开农业外出搞运输赚钱。通过学习和批判，认识到这样搞法，名为“增加集体收入”，实际是削弱农业，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根本利益，是走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于是立即拨正航向，用船队为生产队运输垃圾肥料，支援农业生产。原来，有些社员热衷于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影响大田生产，现在摆正了家庭副业和集体生产的位置，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自留田上种黄草，与大田争劳

力、争肥料、争季节的矛盾。有些长期出外搞临时工的社员，也纷纷回到农业第一线。这样就使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下分散的人力、物力，进一步集中到大干社会主义上来了。

纲举才能目张。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徐行公社的贫下中农提出了“学理论，做主人，种田为革命”和“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不在钞票上兜圈子”的响亮口号，他们以实际行动，冲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去年“三夏”、“三抢”、“三秋”等几个大忙季节，许多生产队在夜工结束以后，大田里还是人群不断。有时一夜之间几亩麦子割好了，事后也不知是谁割的。有的生产队由于地多人少，插秧来不及，其他队就组织劳力主动相帮。据徐行大队统计，仅“三抢”期间受到表扬的先进事例就有一千四百多起。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大大加快了生产进度，提高了农活质量，为夺取一九七五年的丰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夺取高产更高产，不仅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方向道路问题，而且要不断破除“靠天吃饭”等懦夫懒汉思想，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斗争。

这些年来，徐行公社虽然不断发动群众同“靠天吃饭”的错误思想斗争，但碰到收成不好时，这种思想往往又会重新抬头。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教导。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反复批判了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使干部和群众坚定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们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摸索增产的客观规律，努力掌握了生产斗争的主动权。

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总结了生产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前几年，徐行公社生产为什么上去不快呢？他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做到熟熟高产。有时水稻增产了，三麦减产，或者三麦、早稻丰收了，晚稻又脱产。为什么不能熟熟高产，全年高产？他们经过回顾总结，发现主要是茬口品种没有安排好。徐行公社是一九七〇年全部实行三熟制的。开始时，耕作制度虽然改变了，但在种子茬口安排上仍然沿用着两熟制的老经验，种子多数是晚熟品种。这种品种虽然产量高，但生长期长，遇到寒潮提前，晚稻就往往颗粒无收。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在选用品种上又单纯从“早”字上着眼，提出要“赶早不赶晚”，“宁可小穗头，不要不低头”，不论早稻、晚稻都种早熟品种。这样，晚稻脱产的现象是大大减少了，但因为早熟品种生长期短，每季产量低，仍然不能实现全年高产。这些经验教训使他们懂得了，在三熟制的条件下，片面地强调安排晚熟品种或早熟品种，都不能达到全年高产，只有在季节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争取多种生长期较长、产量较高的品种，才能做到熟熟高产，全年高产。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公社是稻棉夹种的特点，决定在确保季节的条件下，扩大一部分中熟品种，减少早熟品种。去年，他们早稻、晚稻的中熟品种都由过去的百分之一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而特早品种却由百分之三十减到百分之五以下，这样既抓住了季节，又扩大了产量较高的品种面积，使三熟作物都获得了好收成。

除了品种茬口的安排，在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措施上，他们也认真总结经验，从三熟制

的实际出发,打破老框框,认真摸索规律。譬如施肥,在两熟制时,基肥都是深施,肥效长,这和单季晚稻生长期长的特点是相适应的。但改三熟制后,如果基肥还是深施,等到肥力上来,作物已将成熟,弄得不好还会延长作物的生长期,影响到后季生产。因此,他们在施肥方法上作了改革,把基肥一次施足,并推广了基肥面施的经验,来个“一哄头”,这样肥效快,水稻移栽后马上可以接到肥力,早返青,早发棵。当然,适应三熟制的特点,强调施肥要“一哄头”,基肥一次施足,也不能搞形而上学,还是要因地制宜。

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生产,徐行公社很多队的农业生产很快地上去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还有一批低产队经常拖了公社的后腿。有一年,有一批生产队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八九百斤,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几,但由于有些队产量很低,全公社平均亩产只有一千四百九十五斤,比上一年只增产百分之一。因此,帮助后进队赶上先进队,不断组织积极的平衡,这就成了挖掘增产潜力促进全公社生产全面高涨的一个重要关键。

过去,徐行公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头,对后进队往往是批评指责多,而对它为什么后进的原因却心中无数,批评不到点子上,反而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收效不大。公社党委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要解决后进队的问题,必须首先从转变领导思想作风入手,从本质上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在县委的支持和帮助下,从前年冬天开始,组织干部分别下去蹲点,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一起劳动。通过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后进队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多数干部都是要求革命、要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有些队所以处于后进状态,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那里干部的思想路线不对头,社会主义的正气不能得到发扬。因此,帮助后进队改变落后面貌,归根到底,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帮助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做法上,他们坚决依靠群众,及时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后进队中好的经验,抓住典型,召开现场交流会,及时推广。通过群众教育群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联群大队秦家生产队,本来是公社有名的后进队,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一斤。去年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抓阶级斗争,教育了犯错误的好人,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的面貌,粮食亩产一跃达到二千零九十八斤,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由于公社党委深入基层,依靠群众,真抓了后进队的转化工作,全公社十八个比较后进的队,革命和生产面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已经跃入了先进行列。有些原来先进的队,也做到了继续革命更上一层楼。现在,徐行公社在去年增产的基础上,正在发动群众,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安排和组织农业生产。他们决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在新的一年里,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中共嘉定县委员会调查组

树木和树人

乐 英

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次我去淮北，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

提起淮北，人们会自然地想起那一望无际，令人感到有些单调的大平原。但是，时代不同了，解放前那一片光秃荒凉的淮北平原，今天已经成了绿树成荫的林海。据一位“老淮北”告诉我，那些挺拔的泡桐和白杨，婆婆多姿的垂柳和果树，都是解放后陆续栽种起来的。我问：“你说‘十年树木’这句话对吗？”那位“老淮北”是一个很有植树造林经验的老把式。他告诉我，多数树木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听了这番话，我感到古人说的“十年树木”，未免太快了。

由“树木”想到“树人”。在淮北平原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不也如同那些树木一样地茁壮成长吗？“百年树人”，未免又说得太慢了。那么长的时间，岂不是一个人胡子长了一大把还树不起来吗？实际上新一代新人的成长，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是非常迅速的。战斗在淮北的那些知识青年，都是在一九六八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陆续来到淮北的，最长的也不过七、八年。他们在党的阳光哺育下，经过三大革命斗争的锻炼，成长得是多么迅速啊！看看这一代风华正茂的新人，难道你不觉得“百年树人”是一句颇为保守的老古话吗？难道你不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用在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上是多么不妥当吗？

当然，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反映了树木和树人都有一个过程。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要有园丁的精心培育，要经过严寒酷暑，风霜雨雪的考验。那些没有深深扎根于泥土中的树木，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淘汰了。只有那根深叶茂的树木才能巍然挺立。人的成长也是如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的迅速成长，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还要有园丁们，即农村的各级党组织、贫下中农和城市工人阶级等各方面人们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大批新干部，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们的知识青年、新干部，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就能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百年树人”，多少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论资排辈阻碍人材成长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决不能因循守旧，搞什么爬阶梯，论资排辈。我们要把“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改为“十年树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抓紧培养一代新人，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有人坚持下去。

加强党的领导 开展教育战线的大辩论

学习康生同志的继续革命精神

复旦大学 唐 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全国人民爱戴的康生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悲痛笼罩着复旦园。这里的一切，都好像在唤起人们的追忆：你知道吗？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同志，曾经来到过这里。你记得吗？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在复旦园的林荫道上，会议室里，校办工厂的车床旁，留下了康老的足迹。

十七个年头过去了，可是当年康老的音容笑貌，还有他在复旦园走过的足迹，都难以磨灭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一九五八年，这是令人难忘的火红的年代。大跃进的浪潮，冲开了紧闭多年的学校大门。在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下，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复旦的校园里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但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新生事物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了摧残和打击，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下午，我们敬爱的康生同志来到了复旦大学。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康生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在一间布置得很整洁的会议室里，革命师生的代表争着向康生同志汇报教育革命的盛况。康生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询问着，谈笑风生，每一桩新生事物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当哲学系师生把一本下乡编写出来的《农民哲学课本》送给康老的时候，康老热情洋溢地笑了，立刻翻开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这是哲学系二年级师生开展教育革命的成果。他们来到浙江钱塘江畔的海宁县荆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成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和“哲学小组”，课本就是为了适应农民学哲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康老很高兴，热情地鼓励大家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这是农民的大喜事！”

哲学系一位同学向康老汇报说：“这本课本是我们用扁担、锄头蘸着汗水写出来的。”

康老赞许地说：“好啊！下乡办学好！学哲学就是要这样。马列主义哲学，毛主席的哲学，是明白学。和群众一起学，越学越明白。关在高楼大厦里是学不明白的。只有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教育革命才能深入。”

康老的话，引起了大家严肃的思考。为什么康老这样热情地赞扬下乡学哲学、写通俗哲学读本，而另一些人则对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呢？就在当时的前一、两年，窜到复旦当“顾问”的苏修专家，猖狂地反对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原则，诬蔑用哲学解决实际问题是大炮打麻雀，“坦克抓老鼠”，是“简单化、庸俗化”。旧中宣部的阎王陆定一，竟说那个苏修专家的话“是一句名言”，公然下令强迫师生要“贯彻专家的意见”。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学校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哲学系的学生只得被圈在高楼深院里关门读书，真是越读越不明白，越读越蠢。有的人哲学课的考试得了五分，在政治上却堕落成了右派分子。康老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座谈会一结束，康生同志又来到了刚刚办起的红旗半导体厂。

红旗半导体厂，是物理系革命师生奋战四十天办起来的。尽管他们办厂的设想遭到了某些人的冷遇，但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自己设计，自己安装；连建厂的大部分材料也是他们从废料堆里觅来的。康老来到半导体厂视察的时候，这里已经试制出了上海第一只晶体三极管。

康老了解了红旗半导体工厂建厂过程中的斗争情况以后，站在楼梯口上，对大家讲了话。

康老着重给大家讲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和党的教育方针。他说：书是要读的，但最重要的是实践，要边干边学，不要迷信书本。科学研究工作要大搞群众运动，要反对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垄断，要敢于打破洋框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还勉励师生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鼓足干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随着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康生同志那宏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你们办的是新型工厂，搞的是新的产品，培养的是新人。这是新的制度，是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的幼芽。你们代表了先进的方向。要好好干！”

校办工厂既然是新生事物，就难免有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当时就有一些“摇头派”、“算账派”，抓住鸡毛蒜皮之类，对学校办工厂大加指责。康老了解到有人指责学校办工厂是“得不偿失”，是“浪费”，就气愤地驳斥道：“这不是浪费，这是学费！应该分清学费和浪费的界限嘛！”康生同志作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生事物总是热情赞扬和精心

培植的。当时试制出来的三极管的质量还不够稳定，康老就鼓励大家说：“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科学研究就是探索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不要怕失败、挫折，只要坚持下去，不断提高，一定能够成功。”

就在康生同志来复旦视察前不久，物理系入学才几个月的工人大学生经过四十天奋战，造出了上海第一台国产单晶炉。康老知道了这件事，极为振奋。他忘了疲劳，又来到了金工厂。

那天，三十几位工人大学生，正在金工厂劳动。当康生同志高大的身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康老用那双坚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工人大学生沾满油污的手说：“你们干得很好，很对！要坚持干下去！”康老仔细地看了单晶炉的样品，还一一询问了工人大学生的学习、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最后，康生同志勉励大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康老对理科办工厂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表示要一个一个地看过去。从金工厂一出来，又神采奕奕地走进了玻璃工厂。

玻璃工厂，也是在大跃进岁月里，因陋就简地办起来的。它设在复旦大礼堂后面的矮平房，并不显眼。但就在这里，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和他的战友们，不顾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阻挠和嘲笑，用土设备造出了一批当时还要从国外进口的高真空玻璃器材。康生同志聚精会神地观看了工人和学生的操作，勉励学生要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并且语重心长地对陪同参观的蔡祖泉说：“工人有教育学生的责任。”康老深情地用手抚摸着工厂的土设备，高度赞扬了工人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时，康老环顾四周，看到无论是工人还是学生，大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显得分外高兴。他提高了嗓音说：“青年同志，大有希望！”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康生同志在离开复旦园的时候，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校办工厂好！”

十七年过去了。康老留在复旦园的足迹还是那么清晰，康老留在复旦园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楚。我们在沉痛悼念康生同志的时刻，心情就显得格外激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没有在教育战线得到贯彻执行，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不是吗？康生同志满怀着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情，亲自在一九五八年来到复旦园支持我们闹教育革命，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给了广大革命师生以多么巨大的力量和鼓舞啊！可是，康老一走，一些人就把康老的指示丢到了脑后。不久以后，在刘少奇、陆定一一伙的策动下，一股冷风吹下来，说什么“劳动多了，学习少了，质量差了”，对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发动了反攻倒算。

康老热情赞扬过的新生事物无一不遭到了无情的摧残。

刚刚打开的学校大门又关上了。在海宁农村办学的哲学系师生，被诬蔑为“头脑发热”，强行拉回了学校。那本《农民哲学课本》，则被说成是“不象哲学的样子”，丢掉了。

工人和革命师生艰苦创办的工厂一律被勒令停办。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的红旗半导体厂，被砍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一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在复旦的校园里神气活现地摧残着青年，摧残着人材。

这是一场多么令人愤慨的倒退，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的教训！

当年受到康老接见的、现任校党委副书记刘洁和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钱孝衡，在悼念康老的日子里，这样地回顾了自己的教训：

“听到康老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回忆起康老视察我校的情景，心情更加沉重。康老谆谆教导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支持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可是我们忘记了康老的教导，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卖力地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维护了学校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把学校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了过来，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今天又有人妄图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学习康老的革命精神，记住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被扼杀的教训，积极投入到当前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

是的，一九五八年受到康老赞扬的幼芽虽然遭到了修正主义冷风的摧残，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阳光雨露下，这些幼芽又重新发芽、生根，而且长得比当年更为繁茂、茁壮。物理系办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工厂，在这里，已经不是只生产二极管、三极管了，而是大批地造出了多种高、精、尖产品。在这里，一代既懂政治、又懂技术，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工农兵学员正在成长。但是，这一切还只是开了个端，教育革命还是处在试验阶段，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今天居然有人再次刮起了冷风，指责教育革命过了头，要把教育革命方向扭转去，这岂不是妄图重演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历史吗？

历史是不允许重演的。在悼念康老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和发扬康老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百折不回地把教育革命坚持到底。

康老在复旦留下的足迹，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是光荣的反修战士的足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足迹。我们复旦大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沿着康生同志的足迹前进！

开门办学好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吹开了学校通往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门。开门办学这一新生事物犹如春天的嫩苗，生机勃勃，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开门办学，来之不易。回顾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斗争，要打开学校的大门，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师范大学在一九五一年刚建校时，学习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师生打起背包下乡搞土改，下厂搞三反、五反，给密不通风的高楼深院开了一扇门。然而时隔不久，刘少奇一伙就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照搬苏联的一套，又对学校关门上锁。一九五八年，广大师生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冲开学校大门，走向社会，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恶狠狠地进行反攻倒算，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重新把学生拉回课堂，死死地关上了学校大门。如果没有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怎么改得了？最近有些人又拾起几片鸡毛蒜皮，把开门办学污蔑为“实践——实践——实践”，大轰大嗡，妄图把好不容易才打开的校门再次关上。这个事实有力地提醒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开门办学的胜利成果，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看待开门办学？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实行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师范大学是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培养中学教师的。无产阶级自己的中学教师，只能在三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成长。修正主义的师范教育路线，关门读书，闭门修养，那只能培养书呆子，或者培养高踞于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列宁说：“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坚持开门办学，就要使广大工农兵学员置身于工农之中，做到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外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学员，大多是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招收的，一进了外语系，那种“将来银幕上再见，屁股上冒烟”的高人一等思想迎面扑来。他们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对着干，大破“外语特殊论”。上学期，他们到农村一面劳动，一面到农村中小学代课。在代课时，有的学员把外语课搬到饲养场去上，结合实际编写课文，练习句型，既学了政治又学了外语，

为中学外语课开门办学提供了经验。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么好的大学生还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毕业后到我们这里来吧！学员也激动地说：“旧大学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们要学工农，爱工农，三年毕业为工农。”

理科开门办学，为结合典型任务组织教学，展开了宽广的天地，但如果开门以后眼里只看到工厂的技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那也会走到“智育第一”的邪道上去。物理系师生到纺织厂开门办学，首先到车间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他们同工人师傅一起挡车，每天来回要跑三十几里路；脚底跑痛了，和工人师傅的心却贴得更紧了。同学们感到有责任与工人一起改变这种“轻工不轻”的面貌。一位工人师傅说：“我们急技术革新，急于改善劳动条件，但更急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语重心长的话，激起了全班同学为革命搞革新的强烈愿望，他们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抓好路线教育，夜以继日地干，搞出了光电自动座车等革新项目。广大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在开门办学中学习工农，他们将是一代新型的教师，这对培养反修防修的革命接班人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啊！

实现开门办学，又是克服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根本途径。旧师大关门办学的修正主义路线，把生动活泼的青年搞成只会象留声机那样背诵万古不变教条的教书匠。师范大学五年毕业，只会围着凯洛夫鼓吹的“五个环节”团团转，这样的中学教师，不懂社会，不懂阶级斗争，只会拿起粉笔背教条，怎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师范大学的学生要学会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本领。这在课堂里能学到手吗？不能。体育系的学员到中学开门办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课堂里，而是积极关心社会阶级斗争。中学里有一个小足球队，有些同学最近一个时期不关心政治，上课打瞌睡，下课拔脚就跑，有时无故旷课。体育系的学员发现这个小足球队在人民广场练球时，有一个“教练”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毒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家伙是坏分子。通过对这个反面教员的批判，教育了小足球队的同学。体育系的同学说，过去认为体育不文不理，是个“武科”，关门练功就行了。现在看来同样要开门办学，在阶级斗争中增长才干。

做一个受工农兵欢迎的中学教师，必须既能讲又会做，能够真正为三大革命运动出力。贫下中农批评旧师大生物系毕业的学生，到了中学“一手拿粉笔，一手拿讲稿，面孔白濛濛，身子轻飘飘”。他们可以在标本室里认一大批花草草，虫鱼鸟兽，一碰到粮棉油，猪羊牛，就一筹莫展。现在的生物系在马陆公社等单位建立长期教学基地，班队挂钩，交换干部，结合生产任务组织教学，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用自然辩证法观点讲清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进化论等基础理论。有一个小组在北朱生产队学植物生理，发现这个生产队在气温低于 8°C 的夜晚揭开尼龙棚布，让棉苗“低温壮苗”。可是按照历来文献记载，原来生长在热带的棉花，低于 8°C 就要死亡。哪一种看法对呢？他们连续几个晚上守在田边测地温，取得第一手资料，并且利用示踪原子的科学实验方法观察到棉苗生长极点是

3°C,把贫下中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另一个组的学员仔细研究上海赤霉病菌的形态,用微生物分类学的知识鉴定病菌种类。他们用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为指导,使棉花试验田获得丰收,及时消灭和预报了病虫害,发病率比往年大为降低。不是有人诬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吗?工农兵学员的回答是:“谁想把我们拉回到关门读书的老路上去,我们坚决不答应!”

开门办学,给大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现在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开门办学降低知识质量,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数学系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提倡“一张纸、一支笔、一个脑袋”搞“三百年以后才有用”的数学,培养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而挖社会主义墙脚,十七年几乎没有为工农业生产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系师生坚持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已经完成了近二百个课题,而且能直接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有的为上海市煤气、自来水管进行设计计算,屏弃了苏修一套陈旧烦琐的算法。有的到外地为自来水公司布线作计算,有的为造船工业打翻身仗试制仪器,显示了工农兵学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的革命风貌。关门办学的十七年,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腿,开门办学的成果,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这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中文系三年级学员通过开门办学,和工农兵理论队伍一起战斗,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王安石诗文选注》、《柳宗元诗文选注》、《封建末世的形象图画》、《李白诗选》、《百年盐场换新貌》等书和成百篇文章,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所能比拟的吗?开门办学的成绩如此显著,只有那些象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而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横加指责。

经过几年的实践,开门办学的路子越走越宽,形式越来越多,和工农兵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文科以社会为工厂,通过社会调查,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理科通过参观访问、参加劳动、试制新产品、接受技术革新任务等形式,结合典型任务组织教学。各系的教学体制、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革。除了办好校内的普通班和培训班外,还走出校门举办各种短训班,协助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农场大学、农民业余大学、农民业余体育大学、电视大学等等。一部分教师和学员参加了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的函授教育。许多系科还把本校的开门办学和工农兵的业余大学结合起来,共同开课,互相学习,做到开门办学和送教上门相结合。南汇县水文站的几位同志说:“你们在这里搞了七个月的开门办学,我们也上了七个月的大学。”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开门和关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斗了十七年,现在也没有停止。这种开门与关门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发生。然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开门办学的春苗,必将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长成雄健挺拔的参天大树。让资产阶级去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我们坚定地宣告:开门办学好!

教育革命的成果不容抹煞

——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教学队的调查

徐 堃 王之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七四年五月以来，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二医)派出了由基础理论课教师和医务人员共一百多人组成的医疗教学队(简称医教队)，先后分两批奔赴安徽阜阳、宿县地区，一面为下乡知识青年举办医科函授大学，一面开展巡回医疗。这一新生事物，就象遍布淮北平原的泡桐树那样挺拔，生机勃勃，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二医在一九六八年，就组织教育革命实践队到上海郊区、皖南山区实行巡回医教，支持农村卫生革命。一九七〇年以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取消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旧学制，改革了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创办了二年制、三年制的普通班。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后，又为回沪知识青年举办了《农村常见病防治》的讲座和短训班，受到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同时，二医的各个附属医院实行开门办院，多次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结合开展血防、计划生育和防治农村常见病等活动，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

二医的广大革命师生和医务人员，在教育革命和卫生革命的实践中，加深了对农村卫生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他们深深感到，要让社会主义占领农村卫生阵地，不仅要把医疗卫生知识送到农村，还要帮助贫下中农培养自己的医疗卫生队伍。适应巩固和发展农村卫生革命成果的需要，一种崭新的医教结合的组织形式——医教队应运而生了。

二医派出的第一批医教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来到淮北农村的。起先，他们又要搞巡回医疗，又要办函授教学，几十个人组成的医教队，从早忙到晚，还是忙不过来。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以兼职教师为骨干，以公社卫生院为教学基地，走群众办学的道路。兼职教师由各公社卫生院选派政治思想较好，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医生担任，医教队首先与他们一起举办备课学习班，明确教学方针、计划、内容和方法，然后由医教队员

同这些兼职教师一起分头为本公社的函授学员举办面授短训班。这样，《农村常见病防治》的函授教育活动就全面地展开了。

二医举办的医科函授大学，努力贯彻毛主席规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队来队去。学制为一年。一年中有二至四周集中在县或公社面授，平时每周有两个半天在公社复训、提高，学员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在教学方法上做到理论上讲透重点，临床上具体指导，自学中消化理解，实践中巩固提高。

一年多来的初步实践证明，医学院校通过派出医教队的形式到农村办函授大学，贯彻医教结合，具有很多优越性。

医教队下乡搞医教结合，首先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成果。

从一九七四年五月到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医医教队从阜阳地区插队知识青年中培养了一千名医科函授学员。以后，医科函授又从阜阳发展到宿县地区，招生二千六百多名。在当地插队知识青年中出现了竞相报名学函授的热潮。有的已婚女青年，不顾天热路远、风雨泥泞，怀抱着婴儿进函授班学习。许多学员农忙坚持学，农闲重点学，雨天抓紧学，利用一切间隙挤时间学。参加医科函授学习的知识青年，一边学习一边看病，走遍了生产队的家家户户，密切了同广大贫下中农的鱼水关系。涡阳县青町公社函授学员翁思恩，初到农村一度不安心，后来进了函授大学，学会了新针疗法和常见病诊断处理，在为贫下中农治病的过程中，思想感情起了很大变化。他为一位贫农老大娘针灸偏瘫时，风雨无阻，每天步行十多里，持续三个多月坚持送针上门，终于使这位病人重新站立起来了。他学会针刺后的几个月内，治疗过一千多人次。后来，他又学起当兽医来了。群众称赞小翁是“身不离劳动，心不离贫下中农”。有些函授学员由于坚持亦农亦医，为贫下中农服务作出了成绩，参加了省、地、县各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受到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鼓励。

医教队下乡搞医教结合，还有助于多快好省地建立和发展农村卫生队伍，有利于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阜阳和宿县地区同全国一样，大批赤脚医生成长起来，广泛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要发展农村卫生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得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一些以行医为名的阶级敌人还在某些地方兴妖作怪。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医生”，还把持着某些大队的医疗实权。医教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支持赤脚医生、巩固合作医疗当作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他们在阜阳地区办了三期赤脚医生短训班，帮助一百二十名赤脚医生提高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函授大学首期结业的一千名学员，已有三分之一被推荐为大队赤脚医生和生产队卫生员，成为巩固合

作医疗制度的有生力量。颍上县六十铺公社函授学员龚德玲担任赤脚医生后，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同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并和社员一起自种、自采中草药三百一十四种，制成膏、丹、丸、散四十八种，成本低，疗效高，使大队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医教队在进行函授教学和巡回医疗的过程中，还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协助大队办好合作医疗点。蒙城县岳坊公社有一个大队，由于管理不善，合作医疗开门第一个月就花掉四百多元，占去资金总数的五分之一。医教队帮助他们健全管理制度，坚持“一根针，一把草”的方向，教会他们治疗常见病的中草药处方。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不仅提高了这个大队的防治水平，而且医药费开支下降了一半。

医教队下乡搞医教结合，也促进了教师和医务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医学院校和城市医院的斗批改。

医教队的队员，由于在淮北地区积极投入了农村卫生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广大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同学习、同战斗、同劳动，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和医疗卫生工作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函授学员大搞群防群治，使当地常见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并诊治病员十一万五千多人次，做了一千多例手术。医教队在蒙城县，收治了一位骨瘦如柴、腹大如鼓的贫农老大娘。她患卵巢肿瘤已近十年了，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破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医治。这一事实，激起了医教队员的满腔义愤，决心把切除肿瘤当作一场批修仗来打。他们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设想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二十几个“怎么办”，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地切除了七十多斤重的肿瘤，使那位贫农老大娘投入了集体生产劳动。在农村进行医教结合的实践中，医教队员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医院和医学院校斗批改的方向。

为了适应农村卫生工作的需要，医教队破除了过去基础课教师同临床医生分工分家的习惯，改变了旧医学院“医生的老师不会看病”的怪事。基础理论课教师在边干边学中看门诊，顶岗位，用革命行动克服修正主义路线给自己带来的缺陷。参加医教队的医务人员，打破了“分科如隔山”的机械分工，看外科的学着看内科，妇产科医生学着看小儿科，努力做到一专多能；破除了过去城市医院“用听筒（医生）的不拿针筒，拿针筒（护士）的不拎铅桶”的资产阶级等级观念，医生兼做护士工作，护士、化验员也学习看病。在第二批派出的医教队员中，有八位是七五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过去六年制毕业的医科大学生，要经过三、四年才能正式讲课，而现在这些工农兵学员，一毕业就能为函授学员讲课，还能做到独立看门诊、管病房，这难道是旧大学所能比拟的吗？贫下中农欢迎的这种没有架子、一专多能、中西医结合的医务人员，只有经过教育革命的新型医学院校才能培养出来。医教队的实践证明，教育革命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正当医教队在淮北平原广植新苗、函授学员大批茁壮成长的时候，教育界出现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诬蔑教育革命降低了教育质量。医教队员和广大函授学员在总结医教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驳斥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种种谬论。

医学院校派出医教队下乡，是实行开门办学，实行同工农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这同关门读书的旧大学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二医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七千多名毕业生，竟没有一个留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培养的医学院毕业生，脱离工农，脱离实际，满脑子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有个业务“拔尖”、留院重点培养的学生，一次下乡搞血防工作，面对一个铊剂中毒的病人竟见死不救，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宣扬“我是中国第一个听到铊剂中毒者心脏逐步停止跳动的人”。而现在，医教队办的函授大学的学员，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为贫下中农服务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濉溪县南坪公社函授学员秦溱溱，在党支部领导下，深入细致地落实计划生育，积极推广新法接生，她所在的大队被评为全县计划生育的先进集体。她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多次抢救急症和难产病人。在一个北风怒号的深夜，小秦出诊救治一位羊水破了很久的产妇。由于分娩时间太长，婴儿因缺氧严重而发生窒息，情况很危险。她不怕脏，不怕累，对婴儿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把婴儿嘴里的粘液一口口吸出来，终于使小生命得救了。随即小秦又果断地采取抢救措施，使产妇也安全脱险。函授学员中类似这种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动人事例，在千里淮北的村村舍舍，到处在热烈传颂。

旧二医培养的学生，“一年不沾医学边，二年不沾临床边，六年不沾工农边”。所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也是大洋全的一套，不适合农村。不少人毕业后，对常见病、多发病根本不会独立处理。现在医科函授大学的学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中西医结合，不仅能独立工作，迅速有效地治愈许多农村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他们用一根针一把草治愈了坐骨神经痛，腰椎变形，关节炎，胃下垂。用推拿治愈了小儿疳疾、痢疾……。亳县才河公社有一位生产队长的手被碰伤，发生严重感染，有的医生认为这只手恐怕保不住了。后来经过函授学员李洁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花了二十多天，患者伤口长出了新肉，保全了上肢，恢复了健康。

教育革命的成果不容抹煞。医教队下乡一年半来的革命实践证实了：医教结合是教育革命和卫生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事物。医教队这一社会主义的新苗，必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舒枝展叶，更加茁壮地成长。让那些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评头品足、指指点点，甚至要加以扼杀的人们，看一看这铁一般的事实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谷超豪

最近，在教育界有一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排挤、打击知识分子，弄得“知识分子都没有积极性了”。这完全是造谣。我从全国解放以后就在大学里工作。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以来九年，我深深感到，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坑害我们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这样一个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初步改造，焕发出革命青春。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那种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谬论，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列宁曾经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事实正是这样。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教育，是过去几十年根本无法比拟的。

我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但由于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全国解放后，我只管微分积分，不问方向路线，得到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欣赏，派我到国外去“深造”，带回来了一个“博士”的头衔。我严重地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实践，孜孜以求的是成为资产阶级的“院士”，也就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不久，我在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和系里革命师生一起几次来到市郊罗店公社参加农业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从未去农村参加过劳动，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到农村，弱点就马上暴露了。割稻吧，累得腰酸背痛，一个人远远落在后面。挑担吧，挑很轻一点点，就步履踉跄，不成样子。至于思想上的差距，那就更突出了。有一次突然下暴雨，在暴雨将来时，贫下中农都不顾自己家里晒的东西，迅速奔到场地，奋力把集体的麦子堆好、盖好；大雨下来了，身上湿透了，他们仍坚持奋战，直到把所有集体的财产都保护好。又有一次邻村失火，同我们一起劳动的一位工宣队师傅马上奔赴现场，不顾生命危险，爬到最危险的屋顶上，奋勇扑救，终于扑灭了火焰。工人、贫下中农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啊！可是，过去自己却把资产阶级院士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越滑越远。从留学回国后到参加“四清”运动前的六、七年间，不要说去农村劳动，工

业劳动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校内零星劳动的时间加起来总共只有十多天。越不劳动，越怕劳动。修正主义路线却把我说成是教师“革命化”的一个典型，我很听得进，到处宣扬自己的“成长”过程，不仅害了自己，而且还毒害了青年。正是通过多次下乡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开始找到了自己过去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的世界观上的原因，开始对修正主义路线坑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感到非常痛恨。不是有人诬蔑文化大革命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吗？其实，对于积极性要作阶级分析。过去我也有积极性，但那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积极性，在工人、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面前，我的这种积极性太可耻、太渺小了。只有坚决破除搞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才能有坚持同工农相结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决心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一辈子。“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自己过去走错了路，今后一定要奋发努力，争取为党多做有益的工作。

领导上很了解我的心情，在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之后，就分配我一定的工作，让我进一步在实践中改造旧思想，并使我有发挥自己的专长的机会。

我感到过去自己犯错误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没有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不仅政治上迷失方向，业务上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前进，就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发起进攻，在斗争中肃清它对自己的影响。这几年来，我认真地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毛主席哲学著作，学习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数学手稿》等书的大部分内容。我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了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的发展历史，清楚地看到数学的理论和一切其他理论一样，其来源只能是实践，也必然要回到实践中去验证。可是，长期来那种轻视实践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自己头脑中、在数学界都有很深的流毒。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数学家遗忘了物质，是“物理学”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源。我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成《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一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对过去和当前的一些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开展了批评。这篇文章对我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也是一次清算。我过去看数学研究成果价值如何，就看题目难不难，是否提出了独创的方法，结果是否出人意外等等，片面地强调所谓理论，轻视实践经验和实践验证。不破除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就无法迈开新的脚步。我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也是与教育革命的推动分不开的。几年来，数学系师生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回想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数学系的教学和科研，都是关在高楼深院里搞所谓纯数学理论，与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实际毫不相干。抚今思昔，数学系的变化，是对教育界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击。

指导思想搞明确了，工作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以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所提出的数学问题，让理论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某科研项目急需解决有关的数学问题，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和几个同志一起为有关单位办了短训班，讲解一些基本原理和介绍国外最新成果。接着我们又根据项目的需要去求解某些偏微分方程。工作中，我不限于对这些方程作一定的理论分析，而是把

主要注意力放在有效的计算方案的选择上。数学归根到底要靠数字解决问题。但说也好笑，象我这样一个数学系教授，过去竟然从来没有在计算机上搞过数字计算。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就从头学起，从编写程序，穿纸带，改纸带，到上计算机操作，我都学着做。因为题目较大，有时要通宵算题，有时是半夜开始上计算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解出了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算出了国内过去未曾算出来过的一些数据，得到了应用。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我写了五十来篇数学论文，没有一篇在实际中发生过作用的。比如说，有两三年，我主要研究如何把一种几何空间“安装”到另一种几何空间去，关于这种“安装”问题的论文也写了好几篇，但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几何空间，这种“安装”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而现在，经过集体的劳动，能够把有用的数据送到技术人员手中，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尽了一分力量，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在和工厂技术人员的接触中，看到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努力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的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例如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陈惠波同志，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他看到过去从苏修和其他国家进口或仿制的无缝钢管矫直机质量太差，非但在矫直时造成钢管大量浪费，而且影响一些重要工程的质量，非常痛心。他不顾有些人的阻挠讥笑，在工人同志支持下，打破了苏修权威的洋框框，提出了新的方案，在上钢五厂进行试验。我去上钢五厂听他介绍了这些情况，又看到了工人师傅满腔热情地支持这项革新，很受感动。为了帮助他解决数学上的某些疑问，验证他提出的方案，我当晚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证实了他的计算方案是合理的，并且立即编了程序，连夜去穿纸带，上计算机试算，所得结果和他的完全相符。在试验的过程中，他带来的计算结果数据太少，不能适应在上海进行加工的需要。为了帮助解决这一困难，我又进一步修改了纸带，算出了适合加工需要的数据。

我们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数学为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服务，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人说，这几年是“不要理论”，这完全是捏造。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作用，马克思本人就从事过微积分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在什么世界观指导下，为着什么目的去搞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术理论研究，根本不谈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流行的是“马克思不能指导”那一套，甚至有人对于一些在哲学上有明显错误的著作，非但不敢碰，而且还唯恐跟得不紧。比如说，在天体物理学这个领域，国外有人把那些局部范围内也还没有证实的假说推广到整个宇宙，得出什么宇宙有限、宇宙最后要灭亡等等谬论。难道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还要跟着它去转吗？我们当然也需要研究天体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但这种研究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要为广大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九七二年，我了解到国际上流行着一种“黑洞”学说，预言在宇宙中存在着引力场非常强大的天体，以致连光线也只能被吸引进去。这本来是一个假说，作为一种局部的、短暂的现象，固然也还可以有分析地进行一些探讨。但有的人却一下子就把它设想成为一个宇宙原理，预言宇宙的末日就是成为那种死灭的黑洞，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没落腐朽性的反映。对于这种讲法，我认为既要从哲学上加以批判，同时也要从自然科学上分析一下它的荒谬性。我反复学习了《自然辩证法》关于吸引和排斥的论述，受到了很大

启发。黑洞学说是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的。我发现，就是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范围之内，黑洞学说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我将自己研究的结果写了论文，提出了同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有一定科学根据的看法，来反驳那些错误的论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还很粗糙，但对资产阶级关于宇宙末日之类的伪科学，也算是开了一炮。

数学是从物理模型中抽象出来的。恩格斯说得好：“人们还在设想，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而客观世界决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可是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可见，数学工作者需要密切注意数学和物理学的联系，以促进数学理论的发展。我曾经对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一年级学员讲虚数，我用圆周运动、交流电、波动现象这三种互相联系的重要物理现象，由浅入深地说明了虚数的现实原型，学员们感到很容易理解。在理论科学研究方面，一九七四年六月，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来上海访问，他建议和复旦大学的教师合作进行有关规范场的研究。领导安排我和其他六个数学、物理教师参加。由于大家平时参加校内的近代物理讨论班的活动，也都比较注意数学和物理的联系，所以杨讲物理，我们能了解，我们结合物理讲数学，他也能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和杨振宁教授共同研讨，在几天之内，就做出了两项成果，后来又陆续获得了一批结果，对规范场理论的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和充实。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我收到了杨振宁教授和他的同事新完成的论文，其中提到电磁场强度在什么程度上决定它的规范场问题。这是电磁场理论中的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仔细分析了强度和势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经过一定的计算和分析，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的回答，取得了一项新的、有理论意义的成果。这些事例都说明，这几年我们决不是“不要理论”，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理论。

回顾几年来思想上、工作上的收获，我深深感到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我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沿着修正主义道路滑下去，一定会堕落成现在某些苏修院士那样的人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也会在我国重演。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农兵的热情帮助，使我对旧教育制度、修正主义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世界观改造方面有了一点进步，并使我的科学工作的面貌也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十分珍惜这个新的起点，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投身三大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我自己的一切力量。那种诬蔑文化大革命挫伤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论调，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是别有用心。过去彭德怀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反党反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人要为知识分子“请命”，名曰“关心”，实际上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对于他们的种种怪论，必须坚决予以批驳。我愿意与同志们一起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新花朵朵春满园

——复旦大学教育革命展览会巡礼

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十个年头的春风，我们参观了复旦大学教育革命展览会。这里展出的教育革命成果，有力回击了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

清晨，我们沐浴着朝阳朝校门走去。沸腾的校门口，象往日一样，迎来了一批批工农兵讲师、短训班学员；送走了走向各处开门办学的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

这时，有两位同志迎上来和我们结伴同行。看到他们那鼓鼓囊囊的背包里，装着大豆、花生、鱼肉，我们感到很奇怪。一问，原来他们是来自外地的函授学员，是来参加测汞仪使用学习班的。学习班今天将在展览会现场上课，用化学系制造的测汞仪分析食物中的含汞量。这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我们热烈地议论着，从测汞仪谈到敞开的校门，从学校的大门谈到工厂的大门，谈到人民公社的广阔天地……

已到展览会了，我们还尽情地谈着。

“哎，你们在谈什么？”背后传来了一个浑厚的声音。

这是生物系的工宣队员叶师傅。他听到我们在赞扬开门办学的好处，显得格外兴奋。叶师傅说：用贫下中农赞扬我们生物系开门办学的话来说，就是——

“我侬欢迎这样的泥腿大学生！”

在展览生物系开门办学的专栏面前，叶师傅带我们看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位青年教师和几位工农兵学员，蹲在青枝绿叶的棉株面前，仔细地观察着。他们在观察什么呢？叶师傅神秘地笑笑说：“他们在观看一场战斗。”

“一场战斗？”我们感到吃惊。

“真的。是生物界的一场大战。”

叶师傅告诉我们，在昆虫中，棉蚜虫的天敌是瓢虫。但是在上海郊区有好多种瓢虫，哪一种瓢虫最能吃棉蚜虫呢？生物系的师生在农村这个大课堂里，跟贫下中农一起，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发现黑襟毛瓢虫是棉蚜虫的最大天敌，还发现黑腹蜘蛛是棉铃虫的天敌。叶师傅说：“这些发现很有意义，为搞好农作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创造了条件。”叶师傅指着那张照片说：“他们正在观看的，就是一场瓢虫捕食棉蚜虫的战斗。”

叶师傅的话，引起了参加测汞仪短训班的函授学员的浓厚兴趣，他们抢着问：“综合防治你们做过试验吗？”

“试验过。”叶师傅介绍说：“我们种了三亩地棉花。当棉株上发现了棉蚜虫时，瓢虫跟着棉蚜虫的大量繁殖也成倍增长，最后棉蚜虫都被瓢虫吃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综合防治、以虫治虫的光明前景。”

“太好了！你们还做过别的试验吗？”

“有。”叶师傅说：“稻瘟病的危害极大，对这种病至今还未找到科学的预测预报方法。我们北桥教学点的师生，正在研究植物本身的抗病性指标，希望从中找到预测预报方法。”

“对，听说你们在研究病毒性病害方面，已经有所突破？”我们插问道。

叶师傅说：“发生在江南几省和上海郊区的大元麦黄花叶病，五、六年前做了个生理性病害的结论，发现病情，就打药水，打而无用，白白浪费。现在我们系和教学点的几个教师、研究生，经过大量的调查，并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病毒的形态颗粒，证明这是病毒性病害，推翻了先前的结论。”

叶师傅还讲了遗传专业师生研究杂交优势、花粉培养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事迹。他还没有说完，函授学员就赞许地说：“现在，你们为农服务的路子走得好宽呀！”

这时，叶师傅显得严肃起来。他说：“可是有人反对走这条道路，说这样做是在培养植保员。一九七一年，在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就有人赶到北桥污蔑我们方向错了，要我们立即向后转，回学校。当时，我们是顶住了。但今天教育界又出现了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听了叶师傅的介绍，函授学员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把脚跟扎在田头上，沿着毛主席指明的道路前进。”

“把脚跟扎在田头”，这话说得多好啊！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生物系，从未研究过农业昆虫，有人对研究苍蝇飞动时一秒钟扇几次翅膀却很感兴趣。从关在高楼深院里到投身农村广阔天地研究水稻、棉花上的虫害，这个变化使我们真正理解了贫下中农欢迎泥腿大学生的含意。

我们今天的工农兵学员，时时都在想着怎样使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他们认真地对待着一张张——

来自生产实践的答卷

展览会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台箭杆织机。工人们围着它，欣喜地观看，亲切地抚摸着。

这是一种新型织机。曾经有个国家要我们出相当于两千台普通织机的高价去买他们

的一台箭杆织机。但是，上海帆布五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自力更生把它造出来了。他们在制造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数学问题。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知道了，在放寒假的前一天，打起背包来到了厂里，细致地调查了织机运转、特别是凸轮运转中的数学问题，对工人师傅的发明创造加以总结，找到了设计凸轮的计算方法，解决了织机凸轮的问题，使箭杆织机在帆布五厂和公司所属各厂得到了推广。

类似这样的数学问题，难道文化大革命前不曾提出过吗？不。有个单位曾向一位毕业生提出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封信，里面抄上了几个不解决问题的计算公式。那时候，想的是怎样通过回答高楼深院中的考卷爬上“宝塔尖”，怎么会重视来自生产实践的考卷呢？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化学系师生为提取稀贵金属闯路子的事迹。稀贵金属，就是金、银、铂（白金）、钯。它们有时躲在某种矿渣中，有时从滚滚的浓烟中飞走。怎样把它取出来或者抓住呢？目前流行的办法很落后。这种工艺流程长，回收率低，劳动强度大，对工人的健康也有危害。能不能把这种陈旧的工艺革掉呢？当化学系稀有元素专业的师生来到工厂，在与工人共同劳动中进一步感受到党的期望的时候，便下了决心：宁愿失败，当铺路石子，也要摸一摸这种旧工艺的老虎屁股。当时是搞毕业实践，但是，学员们不怕试验可能失败，毕业论文交白卷；而是急党所急，与工人、技术人员、教师一起奋战。仅仅五个月时间，就获得了初步成功，为萃取稀贵金属闯出了新路子。

也许会有人讥讽：科学难道就是改革一两项工艺吗？这样能培养出搞尖端科学的人才吗？那么，还是请他们到这个展览会来看看吧，新型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正在为社会主义祖国填补一项项的空白。就在这个展览会上，我们做了一次——

愉快的试验

在继续参观中，讲解员微笑地把一只略小于香烟盒子的金属盒放到我们手上。“来，给大伙儿做一次愉快的试验。”经她说明，我们才知道是做心电图。这儿是展览会，又不是医院的诊疗室，怎能做心电图？而且做心电图很麻烦，先要在身上接线，然后原地爬台阶，再躺到床上，又是接线开仪器，做这个简直是“灾难”，怎么能说是愉快的试验？

我们把小盒子还给了她。

我们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把讲解员逗笑了。她自豪地拿着小金属盒解释说：“这是心电图发射器，你只要把它放到上衣的口袋里，我一开动仪器，无线电波就能把你心脏活动的情况发射出来，在仪器上显示出来。”

是的，我们眼前就摆着一台半导体集成化的心电图遥测器，只要你带上那个小小的金属盒，在距离一百多米以内，它都能准确地测出你心脏活动的情况。这台遥测器是物理系无线电接收专业师生跟有关单位合作研制成的，现在已经开始成批生产。不久，它将来到

全国各医院的诊疗室为病人服务；它将走进运动场就地测验运动健儿们在剧烈运动后心脏的情况；它将帮助医护人员时刻掌握危重心脏病患者的病情。

为了庆贺和欢呼它的诞生，就做一次愉快的试验吧！

这时，几个医务工作者来了，无线电接收专业的教师陪他们来取另一架仪器。讲解员迎上去，建议他们等一等，先让大家看看。医务人员急了：“不行，下午要动心脏手术，急着哪！”这一说招来了大家的注意。又是件什么宝贝呢？我们走过去看，但迟了，医务人员已经把它取走了。原来，这是血液流量计，是心脏手术过程中掌握血液流量和血压变化的重要手段。有了它，不需要另切伤口就可以测知血液量；有了它，就可以避免心脏手术过程中的意外死亡。它是医务人员的“战友”，手术病人的“知音”。目前上海国产的只有这一台，各医院在抢着用。

“这仪器是医用仪表厂造的吧？”

那位老师回答说：“是的，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果。”

他接着说：“有关部门下达了制造血液流量计的任务。医用仪表厂原来是个专造体温表的厂，但他们解放思想，把这个任务接下了。他们几次来复旦要求协作。我们四个学员、两个教师跟这个厂五位工人结合，终于为国家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个事实，使师生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个真理：只有与工农群众在一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面前的又一个教育革命的成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煤矿工人们亲切地称它是——

煤井的哨兵

煤井的“哨兵”并不是人，而是一台激光瓦斯警报仪。

提起激光新技术，人们就会想到，在沸腾的杭州湾，现代化码头的建设者们是怎样运用激光经纬仪，战胜海湾的涌浪，突破夜晚的黑暗，定位打桩，给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基的！这架激光经纬仪，是激光专业的师生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成的。当我们请激光专业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架仪器的情况时，他却指着台子上的另一架仪器，考问我们，把我们难住了。

“这就是‘煤井的哨兵’。”

旧社会，在祖国各地的煤窑里，有多少人因为瓦斯中毒而身亡！又有多少次因为瓦斯爆炸，使成百成千的工人葬身煤山！解放了，煤矿工人苦难的历史结束了，可是，瓦斯仍然阻碍着煤炭工业的大干快上。怎样来消灭这个敌人呢？得找一位忠诚的“哨兵”，让它在井下监视瓦斯，随时报警，排除险情。现在，激光专业的师生和有关单位合作研制成功的瓦斯警报仪，就能起到这样的“哨兵”的作用。

这位“哨兵”可靠吗？

“它可忠诚啦！瓦斯一接触它的光束，它就‘按动’电钮报警，任你瓦斯多少狡猾，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好个忠诚的“哨兵”呵！不久的将来，当全国每座矿井中都有它值勤，当煤矿工人站在它的面前，他们心海里将会卷起怎样的感情波澜呢？他们也许将情不自禁地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唱一曲赞歌吧！为知识分子跟工农相结合而叫好吧！

其实为教育革命唱赞歌的又何止煤矿工人！

在这里让我们再给印刷工人、邮电工人、资料员们报告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激光专业的师生与有关单位合作，已经完成了汉字存储器实验装置的研究。印刷自动排版，电报电讯的直接翻译，资料的自动检索，把这种理想变为现实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教育革命的成果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已经初步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复旦大学现在已有三个校办工厂，与一百三十多个工厂和人民公社固定挂钩。在有些人看来，理科大学办工厂，这是“野牛闯进庙堂”。可是，理科大学的真正变化，正是在这——

“野牛闯进庙堂”以后

请看一看吧！这是复旦大学“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工厂生产的半导体材料：单晶硅，砷化镓，半导体发光材料，数码管。几年前我们还不能生产的砷化镓，现在已用上了先进的工艺，产品还可以支援兄弟单位。我们自己研制的半导体发光材料发出了红色的光华，它的亮度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请看一看吧！这是半导体元件，小规模、中规模集成电路，天上飞的，海上游的，都用得着它。它一个个排列着，记录着“四·一”工厂前进的脚印。

请看一看吧！这是“四·一”工厂生产的仪器和数控机床。与上海第二机床厂协作成功的数控机床，经受了连续运转五百小时的考验，为提高我国数控技术水平作出了贡献，现已出国展览了。

“四·一”工厂已经形成了从材料、元件到整机的生产流水线，形成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制。在这里，每年都有几百名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在结合生产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活动。去年一年，就创造了五百多万元的产值。

资产阶级教育的偏见，总想把教学、科研和生产对立起来。理科一办工厂，他们就叫嚷是“野牛闯进庙堂”。他们的“庙堂”，其实就是高楼深院，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温床。这样的“庙堂”很怕“野牛”闯，但是，非得去闯闯不可。

正当我们在展览栏前流连忘返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一只注入逻辑式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四·一”工厂诞生了，送到展览会来了。我们涌了过去，请“四·一”工厂的同志介绍——

还记得吗？上海第一只半导体三极管，上海第一架用国产元件装配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一九五八年在复旦大学红旗半导体工厂诞生的。当年这架收音机播放着举国上下大跃进消息的时候，是怎样地激动过人们的心弦啊！可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红旗半导体工厂举起了屠刀。一位研究半导体的专家，只能整天关在实验室里根据国外半导体材料的数据研究砷化镓的能谱，对中国自己不能制造砷化镓这件事却感到束手无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潮呵，打破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坚冰！迎着和煦的阳光，“四·一”工厂这枝春苗，在复旦园里茁壮成长。

离开了“四·一”工厂的产品，我们又来到了电光源实验室的展品面前。电光源实验室，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同志，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电光源实验室的同志跟兄弟单位的工人、技术员一起，用灿烂的光源装点着祖国的大地。

夜晚，当我们来到华灯初上的街头，来到欢腾的人民广场，来到城镇的工地和公社的打谷场上，我们就会看到，那青光熠熠的高压汞灯，那倾泻着银波的小太阳，那把黑夜变为白昼的碘钨灯。这些灯呵！最初都是电光源实验室研制成功的。也许已是陈年老账了吧，展览会上已没有它们的影子了，代替他们的是一朵朵电光源的新花。

“请大家先认识一下这种灯吧。”讲解员把一只灯交给我们。这灯连灯脚也只有刀豆那么长，当中的灯泡只比蚕豆大一点。

“这是奇妙的光源。”讲解员说：“这是钨灯，别看它小，发光体小得只有一粒米那么大，可它能发出上千瓦的亮度。它配上投影仪能把显微镜下的细胞组织图面放得很大，清晰地投影在银幕上，在研究肿瘤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请看这张紫色照片，就是投影图……”

“钨灯！有这么大的用处？！”

“配上放映机，不用暗房，可以白天放电影。”

“真的？”我们一阵激动和赞叹！

“那，这又是什么灯呢？”

“这是透雾灯。大雾天为渡船导航。”

讲解员一连给大家介绍了几十种新的电光源。最后，他指着一张统计表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光源实验室跟有关单位、工厂合作研制成了三十种新的电光源，灯的品种有六十个。”

啊！要是把这些都布置在一个灯室里，全部点亮，让我们走进去观赏一下，我们真的会象来到了灯的海洋、灯的世界，既象攀上了九霄银河，又象潜入了海底水晶宫！

我们正沉浸在灯海的想象之中，忽而被讲解员叫住了。她把一粒小白纽扣交给我们。谁知，这也是一盏明灯呵！

讲解员说：“大家见过煤矿工人戴的矿灯吗？”

“在新闻影片中见过，煤矿工人戴在头上，闪闪发光，挺有气派。”

“不对。”讲解员说：“那灯又重又暗，戴在头上真不好受，现在，我们要用这种新矿灯来代替它。”

矿灯，是煤矿工人的眼睛！为什么不早些造出来呢？人们也许会提出这个问题吧。是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有关单位来复旦大学联系过，可是被某些人拒绝了。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才有可能造这种灯！

有人会说，你们理科大学，只管这样干，那样干，还上不上课呀？还要不要掌握理论知识呀？要。问题是怎么上课，怎么去研究理论。难道还要象从前那样，让学生做书本的奴隶吗？不，社会主义新大学的学生要做知识的主人。请听一听——

物理化学课变迁的历史

“物化课，关难过！”文化大革命前，人们这样说。那时，资产阶级权威把物理化学课的形式而上学的系统性、严密性、逻辑性引以为骄傲，“实际不沾边，牛皮吹上天”，有多少青年人在课堂上“坐飞机”，在厚厚的笔记本上苦度青春！

展览会上，有一张触目惊心的统计表：

一九六一年，二百五十一人参加物理化学课考试，一百零八人不及格，四十四人留级。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就由于被这一关卡住了而被赶出了学校。

展览会上，有一瓶催化剂电解银，小小的颗粒象花豇豆似的。就是这颗颗花豇豆，记录了化学系物理化学组的同志与上海溶剂厂的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改造这门课的历史。

上海溶剂厂的设备是从苏联进口的，落后的工艺早被工人们革掉了，就是催化剂还用浮石银。做这种催化剂的石头要从东北运来，靠人工敲打成如豆大小的石子，还要高消耗地镀银。砍掉落后的尾巴，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溶剂厂的工人提出了这个任务。化学系物化组的师生投身于这个战斗，结合催化剂的筛选来上课和做实验，把问题带到课堂上讨论，通过小试、中试、大试，掌握了化学反应的全过程，新的催化剂电解银也诞生了。物理化学课那种形而上学的系统性、严密性、逻辑性被打破了，它的内容却更加切合实际，更深化了。

这瓶电解银证明：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发展，这是真理。

其实，在复旦园里，在实践的基础上注意上好各专业基础课，研究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又何止是物化组的师生呢？微分方程，泛函分析，规范场，基本粒子，引力场，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进攻的堡垒。听吧！陈列在展览会上的小型多功能电子计算机，用它的电子讯号，唱起了动人心弦的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横展在我们面前的是苏修侵略者的一个炮弹皮。这是一位解放军学员入学时从珍宝岛前线带来的。同志，从这颗炮弹皮中，你就可以洞察出我们的工农兵学员是带着怎样一种责任感跨进社会主义大学的呵！

是的，正是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学的生力军，跟革命工人、革命教师团结战斗在教育革命的第一线。

旧大学的学生能写出小说吗？不能，可是我们面前，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中篇小说《新桥》和小说散文集《新课堂》创作出来了！

旧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翻弄过二十四史，直到我们这一代才由工农兵学员写出了人民公社的社史。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写的《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展览会里，你能看到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和上钢五厂的工人在金色的炉台上，评述着秦始皇、刘邦；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谬种被熊熊的炉火烧成了灰土。

在展览会里，你能看到国际政治系的革命师生和益民四厂的工人们，在剖析着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本质，描绘着它那狼外婆的嘴脸，把反霸的烈火燃得通红。

在展览会里，你也能看到经济系的同志们跟贫下中农一起，讨论着巩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优越性，歌颂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展览会里，你还能看到，工农兵学员，革命的教员，在井冈山下，在大江南北，在西双版纳，跟知识青年肩并肩，心连心，共同学习，共同战斗，使函授这枝新苗，生了根，开了花。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呵！艳阳下，春风中，新花万朵！

这里有一本无碳复写纸，作为展览会的留言簿。这种新复写纸产生的本身就是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在这本留言簿上，写下了工农兵对教育革命的赞扬，留下了旅美侨胞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情。来自第三世界的朋友也写下了热情的祝贺和殷切的期望。

此刻，我们强烈地感到，有一支歌象滚滚的激流动地而来——小型多功能计算机放出了我们时代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啊！这是我们心中的歌，千人唱，万人和，回荡在祖国的三山五岳，长江黄河，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的上空。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师 陆士清
学员 张晓林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反修防修的壮丽诗篇

——青年工人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笔谈

顾建国(先锋电机厂):

一九六五年五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井冈山的面貌的变化,是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的缩影。

旧貌是怎样变为新颜的?是革命带来的。革命能改变一切。靠了革命,我们的先辈推翻了三座大山;靠了革命,我们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具有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井冈山在变,中国在变,世界在变。新陈代谢,旧事物逐渐衰亡,新事物不断成长,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革命者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应该做新生事物的促进派,自觉地改造世界,促使事物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毛主席写《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首词的时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主席心中想着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为了使中国永远沿着革命的道路改变面貌,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考虑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破

旧立新的运动。这场运动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蓬勃成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祖国带来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动人景象。群众性的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老、中、青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工农兵理论队伍的成长壮大……等等。新生事物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大地。

再过二十五年,我们祖国将要变成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路线错了,就不但不会使旧貌变新颜,而且会使国家变色人变修。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黄永林(江南造船厂):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

展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九六九年九月窜上井冈山，写过一首名为《重上井冈山》的黑词。重上者，必有其初上。初上井冈山的林彪是个什么样的家伙？翻开历史就很清楚。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把红旗插上井冈山，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时，林彪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主义论调，毛主席曾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对于这段历史，林彪一直耿耿于怀。他跪缩在阴暗角落里炮制《重上井冈山》，竭尽欺世盗名之能事；为自己乔装打扮，明明没有参加“三湾改编”，却贪天之功，把自己打扮成“唤起人间巨变”的救世主；明明是南昌起义队伍中的开小差者，却自诩为“井冈搏斗”的英雄；明明是十足的右倾悲观主义者，却标榜自己“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林彪在写下这首翻案词之后，又连续四次书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招魂幡，并迫不及待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言的根源。”林彪篡改历史搞翻案，就是为了篡党夺权搞复辟。

今天，距毛主席写下《重上井冈山》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止息。有的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算账，总是想翻案。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

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战斗来捍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

肖玉林(东海农场)：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指出了我们无限光明灿烂的前途和前进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曲折斗争，是鼓舞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嘹亮号角。

如何对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是对革命者的严峻考验。蒋介石进行“四·一二”大屠杀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伟大领袖毛主席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当时，革命部队只有几千人，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有几百万人。然而，貌似强大的反动派并没有打垮我们，而是被我们打垮了。毛主席说：“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新兴的力量、新生事物最初虽然弱小，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总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对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只要肯登攀”，就是要勇往直前，继续革命，披荆斩棘。只要我们“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

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好。

王国义(大隆机器厂):

学习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回顾十年来的历史,对我们认清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一九六三年,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国主义在莫斯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还无耻地吹嘘这是“理智和忍耐外交的大胜利”,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搞核垄断、核讹诈,当核霸王。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曾把三家条约的签订吹捧成“预示着春天到来的第一个燕子”。但是,条约带来的并不是“春天”和“燕子”,而是侵略者的铁蹄和坦克。

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们叫嚷什么“我们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缓和”。它把一个所谓赫尔辛基会议及其签订的一纸空文吹得天花乱坠,宣扬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消散”,来麻痹世界人民。事实上,战争的危險不是减少,而是进一步增长了。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玩弄“缓和”骗局最起劲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是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我们要提高警惕,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韩天宇(前哨农场):

“试看天地翻覆”,“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毛主席这些气势磅礴的词句,生动

地概括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我们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放眼全球: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终于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从亚洲大陆到南部非洲,从欧洲南部到中东,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到处都在动荡,都在沸腾。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继续胜利前进。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新老修正主义为了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总是在时代问题上耍花招,妄图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是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胜利,赢得未来。虞信棠(群众印刷厂):

“鲲鹏与蓬间雀”是古代一则著名的寓言。毛主席在豪情奔放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给这古老的寓言注进了崭新的革命内容。鲲鹏象征着不畏狂风巨浪,投身火热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蓬间雀则活龙活现地勾画出那些害怕革命狂飚,背叛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叛徒的嘴脸。这首词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对革命战争的态度,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读着这光辉的诗篇，当年的斗争浪涛在我们眼前涌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势如烈火燎原。从炮火纷飞的印度支那到战鼓隆隆的非洲大陆，人民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世界。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五年五月，两次发表了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声明。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而赫鲁晓夫之流，却被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风暴所吓倒，惊呼“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他们到处吹嘘“仙山琼阁”的幻境，到处兜售扑灭“星火”的“药方”。请看！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风暴面前，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面目是何等分明。

“战斗正未有穷期”，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正是我们深入进行反修防修斗争的又一锐利武器。我们要继续发扬百折不挠、冲锋向前的彻底革命精神，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郑 晓（五四农场）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蓬间雀要去的“仙山琼阁”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赫鲁晓夫摇唇鼓舌、大肆宣扬的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和“土豆加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用“仙山琼阁”来形容苏修叛徒集团的理想世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仙山琼

阁”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赫鲁晓夫一伙就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把“全民国家”、“全民党”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吹得天花乱坠。他们鼓吹的这一套，与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科学共产主义，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人类社会。实现这一伟大理想，首先要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现代修正主义者恰恰在这一点上暴露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仙山琼阁”固然妙不可言，可惜在人间找不到、也永远不可能找到它的影子。唐朝白居易有首诗说：“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的“仙山琼阁”，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罢了。他们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就把自己置于同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世界革命人民誓不两立的地位，到头来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赫鲁晓夫倒行逆施，很快滚进了历史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也是色厉内荏，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苏修上台二十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跌了百分之三十六。今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又告破产，粮食产量比去年减产百分之三十，还不及一九一三年的沙俄时代。“仙山琼阁”成了画饼充饥的笑柄。

历史证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从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中，我们应当激发起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革命能改变一切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

杜 华 章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就不由想起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

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井冈山亲手点燃起革命的火炬。经过了三十八年的战斗，毛主席又来到了井冈山，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首光辉的诗篇，对中国人民在这三十八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作了史诗般的描绘和光辉的总结。

井冈山，它的崇高的形象，象征着伟大的中国革命，象征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革命性格。当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第一次登上井冈山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危急的关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被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葬送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英勇地牺牲了。井冈山，也同全国一样，乌云压顶，处在黎明前的子夜。在这个关键时刻，如鲁迅的诗句所描绘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踏上井冈山，在井冈山上高高升起了革命红旗，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之路。黄洋界的炮声，宣告中国革命掀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一页。

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当时，象林彪这样的悲观主义者，散布种种悲观论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实质上就是反对中国革命走井冈山的道路。正是针对林彪的谬论，毛主席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全党满怀信心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夺取革命的新胜利。历史就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航向向前发展。我们党，

始终高举着井冈山的红旗，经过了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天安门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中国人民象巨人一样站起来了，并且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革命能改变一切。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的见证者，它经受了祖国所遭受的深重灾难，经历了漫漫的长夜，又迎来了破晓的曙光，迎来了红日的东升。一九六五年，当毛主席“千里来寻故地”，重新登上井冈山，井冈山已经“旧貌变新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一个缩影。

毛主席用诗的语言描绘了这种历史的巨变：“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这是一幅绚丽辉煌的图画。山河变了，更重要的是，人也变了。昔日的奴隶，现在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井冈山的人民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改天换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上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毛主席所指引的金光大道，不但通向了高耸入云的井冈山，也通向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

但是，井冈山知道，这一切得来是多么不容易。“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中国革命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绕过多少激流险滩！前面还有更加艰巨的斗争等待着我们。我们夺取了全国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毛主席在词的下半阙，一开头就给我们展示了今日之“人寰”的一派如火如荼的革命景象：“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革命永远不会停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经过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继续革命。“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洞察世纪的风云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我们高瞻远瞩，鼓舞和激励我们的革命斗志。过去的三十八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只是短暂的瞬间。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毕竟“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序幕还不是高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和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者如刘少奇、林彪之流，总是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无差别境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要我们“熄灭”井冈山的革命传

统，“熄灭”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停止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进攻，甚至倒过来象他们一样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以便让已经被打倒了的阶级有朝一日以百倍的疯狂猛扑过来，使中国象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沦落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让井冈山的红旗永远飘扬在祖国的大地上。

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过去是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这样。我们党，已经经历了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二十次、三十次。而国内的反修斗争又总是和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系在一起。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吗？对于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敢不敢顶，敢不敢反，这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检验我们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的试金石。

新发表的毛主席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彻底的批判。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号称“超级大国”，看上去是个庞然大物，可是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过是只可怜的“蓬间雀”而已。毛主席借用《庄子》中关于鲲鹏和蓬间雀的寓言，用鲲鹏的形象比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用蓬间雀的形象比喻现代修正主义者，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毛主席把这二者作了鲜明的对比。鲲鹏是万里翱翔，翻动着“扶摇羊角”——革命的狂飚，席卷着五洲四海。他爱的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革命的风雷中，纵横驰骋，如鱼得水；而蓬间雀只能在茅草丛中上窜下跳，一看到连天的炮火，遍地的弹痕，就吓得要死。“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这辛辣而幽默的诗句，维妙维肖地画出了现代修正主义者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两相对照，鲲鹏的形象，是何等崇高伟大，而蓬间雀的形象，又是何等地鄙陋渺小！

毛主席巧妙地用鸟儿问答的方式，深刻地表现了六十年代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毛主席热烈赞颂了鲲鹏的伟大的革命气概；而对蓬间雀的丑恶嘴脸及其修正主义的谬论，给予无情的嘲笑和批判。“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可怜的蓬间雀不幸而生在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今日之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澎湃着革命的怒涛，连雀儿们的巢穴也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们不敢也不能象鲲鹏一样“背负青天朝下看”，只好闭起眼睛去

梦想他们的理想世界——仙山琼阁。这儿有他们所希望有的一切，就是没有炮火，没有弹痕，没有革命。为了这个仙山琼阁，他们“订了三家条约”——一九六三年七月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也者，就是由他们来发号施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们挥舞核大棒，剥削、奴役和压迫世界各国人民，而不许人民以牙还牙，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他们一面挥舞大棒，一面用假共产主义来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仙山琼阁真是美妙得很，“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种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有的人如刘少奇、林彪之流是垂涎三尺，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嗤之以鼻。请听鲲鹏的回答：“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对于雀儿们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天地翻覆。怕是没有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总是要起来革命，把旧世界，把一切仙山琼阁都打个落花流水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主宰世界命运的，只能是鲲鹏，而决不是蓬间雀。

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一切，创造一切，把一切腐朽的事物送进坟墓，给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扫清道路。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用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这充满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光辉的诗句，充分表达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凌云壮志和伟大的创造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不是曾经嘲笑过我们吗？他们从外面封锁我们，包围我们，从内部来进行颠覆和破坏，可是，他们终于在中国人民创造的神话般的奇迹面前，在中国革命的宏伟步伐面前，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这两句诗正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的一个光辉的总结。革命总是有困难的。有的困难看上去好象是很难战胜的。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一次来到井冈山的时候，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开辟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机会主义者不是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吗？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色政权存在了，发展了，而且终于扩展到全中国。当工农红军举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翻雪山，过草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兴高采烈地以为从此可以把共产主义这“洪水猛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消灭了。可是，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举世无双的革命英雄主义战胜了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包围，国民党的封锁，都没有压倒我们。我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接着又依靠小米加步枪消灭了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蒋匪军。当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党发动突然袭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国际上掀起反华、反共、反革命的逆流，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屈服于他们的指挥棒之下了。可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给这股反革命逆流以迎头痛击，并且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就是靠毛主席制订的正确路线，靠无产阶级的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大渡河到南泥湾，从大寨到大庆，都体现了这条路线和这种精神。

今天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样会遇到许许多多新的困难。就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来说，要把教育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块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上闯出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哪会没有困难，没有矛盾，没有问题！？资产阶级的反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要我们去战胜，去排除；我们缺乏经验，要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去创造、去积累。因此，这场革命必然是艰巨的、曲折的、长期的。教育革命是这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也是这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幻想在一个早上把什么事情都做得那么完善、那么理想。我们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的诗词，就是要充分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一往无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在革命的过程中，用革命的方法促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的两首词都写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它们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反修防修、坚持继续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在继续。修正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总是要冒出来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冒出来了，怎么办？那就象鲲鹏那样，鄙视它，蔑视它，与之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毛主席这两首伟大的诗篇的发表，必将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做革命的鲲鹏，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战！

壮志凌云霄 凯歌响天外

——毛主席诗词演唱会抒感

石 川

音乐的旋律在大厅里回响，真理的声音在心头激荡。毛主席诗词演唱会正在热烈地举行——

全国人民胜利跨进第五个五年计划头一个春天的时候，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了。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有力地鼓舞着我们在新的革命征途上奋勇前进，去夺取更加辉煌的新胜利。广大音乐工作者和工农兵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为毛主席诗词谱曲，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以演唱这两首词为中心的、内容丰富的音乐会，大抒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这真是一个不平常的音乐会。

千百年来的诗词歌赋，掌握在剥削阶级的高人雅士手里，跟劳动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了近代资产阶级“艺术大师”的手里，音乐更被抹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变成了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只有今天，无产阶级开始占领了上层建筑，也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才有可能对音乐加以彻底的改造，赋予它以新的生命，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手中锐利的战斗武器。演唱毛主席的壮丽诗篇，塑造无产阶级这一伟大阶级的音乐形象，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从这些情绪饱满的演唱中，从澎湃激越的音乐涛声中，听到了革命风雷的隆隆滚动，看到了革命旗帜的腊腊飞舞，不禁使人精神勃发，对攀登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高峰，更加充满信心。

毛主席的宏伟诗篇，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光辉史诗，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壮丽凯歌。它与毛主席的其他著作相辉映，是革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集中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奔腾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也是激励着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号角。为毛主席诗词谱曲，在舞台上演唱毛主席诗词，首先要对毛主席诗词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有深刻的理解。这是毛主席诗词演唱会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都写于一九六五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

之中。虽然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斗争的实质还跟三十八年前井冈山的斗争一样。当时，蒋介石叛变，陈独秀投降，革命成果被篡夺，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啊！毛主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井冈山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竖起了无产阶级的火红战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反动派的气焰尽管甚嚣尘上，任你什么“石头过刀”、“人要换种”，革命红旗依旧不倒，星星之火越燃越旺，胜利终究属于无产阶级。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看到革命改变了一切，“旧貌变新颜”，从历史斗争的经验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黄洋界那样的“险处”都踩在脚下了，还有什么险阻不可战胜？毛主席壮志凌云，信心百倍地号召人们走井冈山的道路，以重上井冈山的精神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由井冈山看全国，井冈山的道路是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由中国看世界，中国就是一座“井冈山”。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经验都表明，在前进的道路上，修正主义是最大的绊脚石。它们被“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革命战争吓破了胆，叛卖了革命，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向资产阶级乞讨“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中国人民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既要铲除国内的修正主义路线，也要坚定不移地跟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具有这样的非凡气概和英雄胆略；到充满恶风险浪的江河中去“游泳”；向荆棘遍野、怪石嶙峋的险峰“登攀”，“谈笑凯歌还”，从容裕如，胜算在握。十年后的今天，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对毛主席的这两首词感受分外亲切。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提高了全国人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越来越被世界革命人民所识破，“土豆烧牛肉”已经失去了它的诱惑力。展望未来，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又是气壮山河的战歌，鼓舞着我们笑迎斗争风浪，攀登胜利高峰。

对毛主席诗词巨大的思想深度有了较为透彻的理解，就会产生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千方百计地发挥音乐、歌唱艺术的长处，以急管繁弦去拨动人们的心弦，用高亢歌喉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你听：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井冈山，你是革命的摇篮。那兴国山歌的变奏，把我们带进了郁郁苍苍的罗霄山脉。我们仿佛随着当年秋收起义的队伍，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是八角楼，那闪烁在暗夜中的灯光，就是毛主席点燃的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是七溪岭，毛主席在这里带兵拦截，“不用红军三分力，消灭江西两只羊”（二杨的两个师），这是黄洋界，保卫战的炮声一响，竹签石阵齐努力，打得敌人狼奔鼠突。巍巍青山，埋葬了多少革命志士的忠骨英魂；涓涓细流，呜咽着反动派血洗井冈山的滔天罪行。如今，革命胜利了，花更艳，旗更红，山水一新，莺歌燕舞，一片革命情深；潺潺流水，不尽倾诉欢欣。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啊！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通过雄壮的旋律，激越的音调，反复的吟唱，演唱会突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主题。革命的惊雷在云中滚动，瞬间就会在人间炸响；革命的暴风雨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迎来万里晴空，满天彩霞。风雷起，红旗舞。

这红旗，飘扬在井冈山头，鲜艳夺目，振奋精神；这红旗，插在前进的征途上，光焰万丈，领路向前；这红旗，飘扬在大庆的钻塔上，飘扬在大寨的虎头山上，飘扬在珠穆朗玛峰上，无产阶级将永远高举着它，从一个高峰攀登另一个高峰！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透过那熟悉的国际歌的音调，响彻着人民革命战争的壮丽颂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在炮火连天中诞生，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就是在弹痕遍地的巴黎的街垒里写成的。是十月革命的炮火，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是黄洋界的炮声，报送给反动派的末日，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炮声就是无产者的歌，子弹就是革命者的情。从那动人心魄的旋律里，我们听到了非洲赤道的隆隆战鼓，嗅到了迷漫地中海上空的浓重的火药味，看到了印度支那人民夺回的家园的累累弹痕……炮火迎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弹痕装点着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今朝更好看”！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一声断喝，声若惊雷，气如长虹，表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修正主义的蔑视、愤怒、憎恶，大快人心。什么“三无世界”，什么“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在这一声断喝中原形毕露，复归于虚无缥缈之中。修正主义害怕革命战争，而革命战争不可避免；修正主义扼杀革命，而革命到处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无产阶级对未来充满着必胜的信念，谁也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毛主席的诗词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犹如井冈山的汨汨山泉，潺潺流水，永远探索不尽。怎样才能准确反映毛主席诗词的深刻思想呢？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从毛主席诗词中汲取着无穷的精神力量。“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们决心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勇于创造，在加深理解、准确表现毛主席诗词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发挥各种曲调、各种演唱方法的长处，去攀登艺术创造的高峰，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尽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职责。

由此想到我们的文艺队伍。在舞台上为工农兵演出的，有白发苍苍的老演员，有英姿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同奏一个调，同唱一首歌，旋律是那样和谐，音调是那样高亢。这是一幅动人的情景，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带来的深刻变化。诚然，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数不尽的高峰有待我们去攀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攀登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峰。只有这样，才能一辈子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赞歌。

想到此，我们也禁不住心潮起伏，纵情歌唱。这歌声回荡在万水千山，山河增色面貌新；这歌声回荡在五洲四海，汇成冲决旧世界的滚滚洪流；这歌声回荡在每个人的心里，化成继续革命的强大动力！

抗日英雄杨靖宇

上港三区青年工人 凌永康

上港五区青年工人 傅正宇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东北民歌

一九四〇年二月，在日寇铁蹄下的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日本军官用发绿的眼睛看着手术台上的死者，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象恶狼一样嚎叫着：“快快解剖，我要看看他肚子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为什么他这样厉害！”

中国医生被迫剖开了死者的腹部，胃里全是野草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看来这个使日寇如此恐慌的中国人，临死前已经很久没吃过食物了。日寇军官看到这里，象电烙了似地浑身一颤。

有人偷偷问跟来的伪军：“死的这人是谁？”

伪军战战兢兢地回答：“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

在场的中国医生强忍眼泪，把这个不朽的英名深深埋在心里。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一九〇五年生于河南确山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九二五年在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配合北伐进军，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五月，顶着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的逆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和东北，曾经先后五次被敌人逮捕，经受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我们党哺育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是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

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突然袭击我国沈阳。大卖国贼蒋介石下令东北的中国军队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不到五天，日寇就轻易侵占了我国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地区；三个半月，全部占领了东北三省。

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奋起抗日，组织东北抗日武装，走上抗日前线。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并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代理书记的杨靖宇，根据党的指示，去南满领导抗日游击战争。

傍晚，杨靖宇带了简单的行装，沿着松花江岸走着。对岸传来了一阵苍老、悲凉的歌声：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
中国军队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苍凉的歌声，久久萦回在杨靖宇心头，使他深深感受到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东北河山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不可能由国民党政府来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希望。杨靖宇的耳边，好似又一次响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的号召：

“兄弟们！姐妹们！我们能够象绵羊一样任凭反动统治勾结帝国主义来宰割我们么？我们能够眼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夺么？我们能够忍受殖民地奴隶所受的最惨酷的压迫、屠杀与侮辱吗？我们能够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帝国主义者鞭打、惨杀、屠戮而不作声吗？我们能够眼看自己的姐妹们被人调戏、侮辱、强奸而无动于衷么？不能，不能，一万个不能！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家一致地起来反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海龙一带袭击敌人，打了许多胜仗。杨靖宇的队伍到了哪里，那里的老百姓就象迎接亲人一样地欢迎他们。

游击队进了一个小山村，一位老大娘把战士往家里拖，边拖边说：“到了家还扭扭捏捏做什么。大娘喜爱你们，因为你们真心打日本鬼子，向着我们老百姓。孩子，日本鬼子可把我们村子糟蹋苦了！”

杨靖宇走来了。几个老大爷扑到他面前，颤巍巍地拉住杨靖宇的手，千恩万谢。杨靖

宇亲切地说：“大爷，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打日寇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你不能谢我。”老大爷流着泪说：“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尊敬抗日军队的诚意啊！”杨靖宇说：“把日寇赶出中国，这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打日本，要靠大家的力量。只要人民都起来了，日本鬼子就蹲不长。”

天黑，队伍出发了，村子里的男女老小都涌到村头来欢送。许多小伙子跟上队伍去打敌人。一个老大娘把两个儿子都交给了杨靖宇，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我把孩子交给你了，让他们学共产党，打鬼子。”队伍离村很远了，乡亲们还站在高地上依恋地望着。

为什么人民这样热爱这支军队？“九一八”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军队从这里走过，为什么人民单单热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似乎是为了回答，部队唱起了嘹亮的行军歌曲：

“高高长白山，密密桦树林，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我们为祖国而战，不怕牺牲，勇气万丈，
我们奋勇前进，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一天，队伍在深山里走着，突然刮起了稀有的暴风雪。大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横空倒下，发出轰隆的巨响。队伍无法行进，只得靠近背风的岩石站着。暴风雪继续了好几天，随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战士们又冷又饿，拨开雪找一点野菜吃。傍晚，突然发现雪里埋着一位老人。老人已经冻僵了，身边放着一袋苞米。

他是什么人？他背了这一袋苞米要做什么？大家都围了上来，有人发现旁边桦树上刻着一行字：“送给抗日的红军吃。”原来，这位可敬的老人，是背了苞米来找自己的部队。他不幸遇到暴风雪的袭击，临终前在树上刻下了自己的遗言。

战士们都流下了眼泪。杨靖宇声音哽咽地举着拳头说：“老人是为抗日的军队送粮而死的。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坚持抗日。这是人民的希望。同志们，为了人民，坚决战斗！”

烽火初举龙岗山

一九三四年，杨靖宇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团结抗日的东北军旧部、自发的抗日游击队和倾向抗日的“山林队”，把以龙岗山脉为中心的这些部队都集中起来，进行统一整编。这是南满抗日军队的第一次大会师，宿营地长达四五十里。开了六天会议，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担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部队发展到上万人，活跃在吉、辽两省十余县的广大地区，就连吉林市和沈阳市的附近，也有了杨靖宇部队的足迹。

这个地区正是日寇从朝鲜进入我国东北的走廊，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杨靖宇在这条

走廊上不断袭击敌人,对日寇威胁很大。日寇把杨靖宇惊呼为“治安之癌”,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抗日部队;发动了“春季大讨伐”。杨靖宇率领队伍跳出包围圈,来到了柳河。

日本人不是悬赏一万元捉拿杨靖宇吗?柳河驻扎着日伪一个团,团长叫邵本良。他听说杨靖宇到了柳河附近,以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邵本良对日本“指导官”吹牛:“杨靖宇哪里是我的对手?这回定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牛皮还没有吹完,报丧的电话却已经来了,说是杨靖宇围攻凉水河子,攻得很急,要赶快援救。邵本良心头一惊,没想到杨靖宇动作这么快,看来这人不好对付,本想不去救,但自己刚刚在日本主子面前夸过口,凉水河子又是邵本良的老窝,不救不行,而且一万元赏金终究是有诱惑力的,就硬着头皮去了。

邵本良带着伪军快到凉水河子,手下人又来报告,说杨靖宇亲自带兵进攻柳河县城,守城的一个中队伪军被杨靖宇消灭得干干净净,县城已经落到抗日军队手中。邵本良吓出一身冷汗,连忙回头想去救柳河,这边凉水河子又失守了。

日本“指导官”气得指着邵本良的鼻子大骂:“你的,大大的混蛋。杨的,比你聪敏十倍!”

奴才不中用,主子亲自出马,调来了二千名日军,把杨靖宇的部队围在大荒沟地区。日寇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接连打了两天两夜,都被杨靖宇的部队顶了回去。

鬼子军官正无计可施,忽见饭桶团长邵本良蔫着脑袋站在一边,觉得可以派他一点用场,就伸出一个小手指,向他招了一下。邵本良点头哈腰走了过来,鬼子军官在他耳边咕噜了半天,邵本良连连回答几声“是”就走了。

次日早晨,杨靖宇正在查看地图,考虑从哪个方向突围。放哨的战士跑来报告,说在我军阵地上捉住了邵本良的一个传令兵,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邵本良的一个营长的。信里说:“杨靖宇的部队可能从你们那里突围,你处兵力虽然单薄,但务必坚守阵地,我正调动东边的部队增援你们。”

杨靖宇看完了信,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他对参谋说:“你看,敌人想引我上钩,可是它干得太蠢了。第一,现在包围着我们的敌军主力是日本兵,日本人对伪军的战斗力一向是看不起的,为什么不调动日军来加强薄弱环节,而要由出足了洋相的邵本良来担负这个重任?第二,邵本良送信给这个营长,完全可以走别的路,为什么偏偏要从我们阵地上过?这信明明是有意写给我看的嘛!”

杨靖宇果断地说:“日本鬼子设下圈套,想要我往它的套子里钻,他说的兵力薄弱的地方,正是他把守最严密的地方。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虚张声势地装作要从那里突围的样子,我们的主力却要从另一个方向悄悄跳出去,钻他一个空子。”

深夜,在邵本良那个营长的地段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有人大叫:“杨靖宇突围了!”日本鬼子暗暗得意,把早就准备好了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统统用了上去,子弹象

爆豆子一样在地皮上跳动。在这热闹的时刻，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另一个地方突出了重围。

天亮，鬼子军官才发现包围圈里空无一人，杨靖宇的部队早已远走高飞，不禁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他早先骂过邵本良的那两句话，现在恰好用在他自己身上：“你的，大大的混蛋。杨的，比你聪敏十倍。”

一九三四年这一年，日寇在东满、北满，也发动了多次“大讨伐”，但是都和在南满“讨伐”杨靖宇一样，处处扑空，处处挨打，损兵折将。据日寇的《泰东日报》供认，在这一年中，日寇在全东北“讨伐”中死伤达五万名，因而惊呼中国人“大大的”不好对付。

一九三五年春，党为了统一东北抗日武装，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地游击队、抗日同盟军等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确立了统一的政治领导，划分了作战地区，确定了军事上的协同动作，使抗日军队更组织化、系统化。东北抗日联军共有十一个军，杨靖宇担任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组成，使东北抗日运动大为发展，给了敌人更有力的打击，伪满军和部分日军在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发生动摇和哗变。一天，日军七、八人，偷偷逃离宁安城，向唐头沟来投奔抗日联军，但因迷失路途，只好转回宁安，结果被宪兵抓去杀死了。伪满军中的藤井和李泰山的靖安军，曾经为日寇建立了“赫赫武功”，但在受到杨靖宇部队严重打击和政治宣传后，成排、成连的士兵杀死日本军官哗变反正。日寇急忙把这支部队调回，全体缴械重新改编。这些都是在东北抗日形势的蓬勃高涨下出现的。日寇官方供认，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一九三六年五月，日伪军队被毙伤十四万人，至于有多少人哗变反正，这是日寇一块心病，它的数字当然是不敢公布的。

杨靖宇领导着抗联第一军健儿，转战在东起长白山，西抵辽沈平原，南近黄海岸这一广阔地带。他们机动灵活，又得到人民群众的密切支持，行踪飘忽，敌人挨了打想抓又抓不着，一个个都气红了眼。

一天，伪满通化省次长（副省长）、日寇栗山茂二，收到部下的电报，电文是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写的，“最近各地袭击状况频繁，……工作的推动，甚为遗憾。”栗山茂二看完电报，紧锁眉头，想要从自己污黑的脑浆中，挤出一个妙计来。

几天以后，通化街上忽然出现了一辆日寇的汽车，车上放着一颗火头，敌人嚷嚷说：“通化省治安之癌、共产党巨首杨靖宇被皇军击毙了。”通化的老百姓看到这辆汽车整天在大街上奔跑，心里七上八下地猜疑：“这是真的吗？”

正当这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杨靖宇亲自率领部队，一举歼灭了敌人一千多名，还生擒活捉了这支部队的日寇高级军官。消息象闪电般在通化传开。日寇象挨了当头一棍，一下子都把嘴巴闭上，鸦雀无声地躲起来了。老百姓奔走相告，有的还善意地绘

声绘影：“杨司令会显身法，能够死里复生”，“杨司令能飞檐走壁，日行千里，鬼子那里能抓得住他”。人们把消息变成了神话，神话又化成了鼓舞抗日斗志的力量。

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挑起了芦沟桥事件，蓄意侵占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为了配合关内正面战场，牵制敌人，东北抗日联军也更加紧了敌后游击战争。这时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已改编为三个路军：第一路军以第一、二军为基干部队，活动于南满并进出鸭绿江，杨靖宇担任总指挥；第二路军以第五军为主干，包括四、七、八、十一各军，活动于东满，直达乌苏里江；第三路军由三、六、九军组成，活动于北满。同年，东满和北满成立了地方人民政府，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广大城镇乡村，遍插抗日红旗，飞扬着抗日的歌声。在南满，杨靖宇也积极展开攻势，不断进出南满铁路。这是东北抗日运动的高潮时期。

日寇痛感到插在背上的这把尖刀严重威胁着自己，因而疯狂地出动“讨伐”。这年冬天，日寇的精锐“犬养”部队二万人，配合飞机百余架，向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恶狠狠地扑来。

杨靖宇得知这一情报，立即进行研究。杨靖宇说：“管他什么‘犬养’‘马养’，统统没啥了不起。敌人远距离奔来，还弄不清我们的位置，所以兵力配置比较分散。我们要发挥游击战的威力，以一部分部队实行分散的近距离的突击，不让敌人集中兵力，同时把另一部分部队集中在手里等待时机吃掉敌人一股。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也要一股一股地消耗它、消灭它。”在做了通盘的布置后，杨靖宇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临江地区伏击敌军。

这时候，由于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伪军中不少人不想真心替日本人卖命。杨靖宇把部队带到临江甲砬子沟埋伏起来。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山，中间一大块平地，两头是狭窄的沟口。杨靖宇把部队布置好后，心想：要是再有几挺机枪，安在沟口，就更好了。有干部说，附近有一个伪军中队，过去在战场上受过我们的教育，已经老实得多了，可以到他们部队里去“借”几挺机枪来用。

伪军中队队长一听吓坏了。借机枪给抗联去打鬼子，这可是拿着脑袋当玩具，险哩！但再一想，自己上次从抗联的枪口底下被放出来，他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叫我不要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今天如果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想来想去，就偷偷地“借”了。

杨靖宇在甲砬子沟打了一个很漂亮的歼灭战，日伪联合军千余人送了命，死的大部

分是日本鬼子。许多伪军学乖了，他们朝天“啪、啪”地打几枪，因而保全了性命，抗联的子弹好象长了眼睛直向顽固的敌人身上钻，那个反动成性的邵本良就在这时被打死了。

接着，杨靖宇又亲自指挥了攻击辑安县日寇警备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人，生俘了日寇顾问小林、竹冈等人。在通化、临江等地，杨靖宇一次又一次打击敌人，所谓“皇军剿匪之花”的敌人第三十四团，也被杨靖宇埋葬在大蚊子沟里，腐烂发臭了。

最艰苦的岁月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全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日寇为了巩固后方基地，更加紧了向抗日联军的进攻。东北抗战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艰苦时期。

杨靖宇根据党的指示，为了不使东北抗日联军同全国抗战隔绝，从第一路军中组织力量发动西征，以便打通与热河八路军的联系。他先后两次率领三个师西渡辽河，先头师还曾经突入到康平、法库，但由于日寇在这平川地带驻扎了大量战略预备军，进行严密兜截，抗联终于未能穿越辽沈平原，只得回到长白山区。

杨靖宇西征归来，到达柳河，日寇也跟踪到达。这一次，敌人调遣了混从一至十二旅（日、伪合编的部队），骑兵第一、二旅，加上森林警察队、宪兵队、讨伐队、日本守备队和日本文学部等共二十多万人马，向抗联扑来，妄想一口吃掉。杨靖宇指挥部队直向鸭绿江边的临江急进，想把敌人甩掉，但凶狠的敌人紧紧咬住不放。

抗日联军在山区得到人民的支持。农民自动担任侦察、警戒、运输、救护等工作，还抗着土枪直接参加战斗。因此抗联行动自如，消息灵通，日寇却象盲人骑瞎马，到处乱闯，一点便宜也沾不着。

敌人为了割断抗联和人民的联系，在他们所到之处进行大烧杀，“集家并屯”，把小村子烧光，强迫农民搬到大村子去住。这个大村子就叫做“集团部落”，有大批警察、特务进行监视。敌人又把山上的猎户、采人参的农民都当作游击队，将全家残杀。抚松全县采人参的散户共五、六千家，都驱杀以尽。长白山脉的龙岗山、老岭、威虎岭、牡丹岭所有山边村落、山中散户，基本上被日寇烧光杀绝。抗日联军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不得不逐步退向深山老林。

一九三九年九月，长白山的雪已经积到齐腰深，杨靖宇率领着部队进入一片原始森林。北风卷着大块的雪在空中呼啸。部队长期行军，十分疲劳，杨靖宇通知就地宿营。战士们坐在雪地上，围着篝火，这就算是“宿”营了。有的战士边煮野菜，边唱着：

“天大的房，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深林是家乡，野菜、树皮是食粮……”

部队断粮已经好几天了。群众曾经偷偷埋在地里一些粮食，有意留给游击队吃，可是有的被敌人破坏，有的被狗熊刨出来，糟蹋光了。

炊事员捧了一把炒黄豆，送来给杨靖宇吃。杨靖宇问：“黄豆不是已经没有了么？”

炊事员说：“这是各班战士省下来的。他们看到司令员越来越瘦弱，都很着急。”

“这怎么行！赶快送回各班去，给战士们吃。他们又要打仗，又要放哨，很辛苦。”

炊事员为难地看着手里的黄豆。黄豆并不多，但这是在断粮的日子里，战士们一粒一粒节省下来的，里面凝结了多少战士的深情厚意！

炊事员到班里去了一次，又回来了，手里的黄豆一粒也不少。

“司令，战士们都不肯收，说一定要请司令吃。”

“他们自己吃什么？”

炊事员热泪盈眶，低声回答：“他们有的吃野菜，有的……有的吃浸了雪水的棉絮。”

杨靖宇转过身去，静默了一回，回过身来对炊事员说：“拿去给病员吃吧，不许再拿回来一粒。”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杨靖宇的两个颧骨更加突出了。十几年前，他在敌人法庭上，被敌人从鼻孔里灌辣椒水，至今一吹冷风，从鼻腔到脑门都又酸又痛，两膝的关节炎，也发作得更厉害了。可是他那满是胡楂的嘴角上，依然露着笑容。他走近火堆，紧挨着战士坐下。战士们见到杨靖宇，都很亲切地围了拢来。

杨靖宇说：“同志们，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肚里没有粮食，但我们能够顶住，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

一个战士说：“司令，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在荒山沟里吃野菜，喝雪水，全不打哆嗦。我心里只惦记一件事：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在这里坚持抗战吗？”

杨靖宇兴奋地说：“知道的。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毛主席去年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已经传到了我们东北。毛主席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毛主席还提到我们东北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毛主席说，如果全国农民也都象这样组织起来，就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战士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用笑声把饥饿和寒冷赶跑了。

杨靖宇又说：“当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我们能战胜它。东北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家乡，现在不是日本军队包围着我们，而是日本军队被我们中国人包围着，他们跑不掉了，一定要完蛋。”

“说到粮食”，杨靖宇指着几棵榆树说：“这榆树皮，就是粮食。我小时候在河南老家，也扒榆树皮吃，穷人都靠它活命。我们今天吃榆树皮，不是为活命，是为了吃饱了有力气好打日本鬼子。就是将来革命胜利了，建立了社会主义，也不能忘记今天的艰苦生活呵！”

战士们细细领会着杨靖宇的话，接着就动手剥榆树皮，煮了起来。一会儿，煮了黑糊糊粘胶似地一罐。杨靖宇先舀出一勺，尝了一尝说：“这比吃糖稀粥还有味哩！”于是，大家都高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正吃着，“叭！”林外响起了枪声，敌人又追来了。杨靖宇沉着地指挥部队转移，他要大家都把鞋子脱下来，鞋头朝后，绑在脚下，部队悄悄地向高山深处走去，雪地上却出现了一串方向相反脚印……。

生命不止 战斗不息

一九四〇年一月，长白山区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野兽早就躲进了地下洞穴，觅食的飞鸟冻得从半空中直坠到地上，就连百年大树也冻裂了，哗剥直响。在这样一个少见的严寒季节里，抗日联军的战士们为了打击日寇，依然出没在林海雪原。

由于环境越来越残酷，杨靖宇把部队编成十人一队的小队伍，分散活动。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队去濛江找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研究粉碎日寇冬季攻势的问题。日寇这次冬季攻势，出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是几年来用兵最多，历时最长的一次进攻。形势十分严重。

二月十六日，杨靖宇带了十个战士到了濛江城外大青沟的一座山林里，突然同一股敌人遭遇了。敌人发现其中有杨靖宇，就紧紧钉住不放，同时从四面八方调集部队。杨靖宇迅速指挥转移。为了不留下脚印，他们在雪地上前进，悄悄进入了山高林深处。当敌人大部队赶到的时候，抗联战士象飞了一样无影无踪。

在深山里同敌人捉了两天“迷藏”，天黑下来时，杨靖宇找了一个破败了的窝棚，叫战士生火取暖。大家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警卫员取出在山下保存的一块苞米饼给杨靖宇吃。杨靖宇说：“大家都饿了，你把它搞碎了，煮点汤给大家一起吃吧！”警卫员掰下半块饼煮汤，剩下半块又装进口袋，留着下顿吃。一小罐苞米汤煮好了，战士们谁也不肯吃，都说：“司令，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你吃吧！我们年纪轻，抗得住。”杨靖宇说：“我是吃苦惯了，饿惯了。你们身子骨嫩，你们吃吧！”推来推去，最后杨靖宇下命令：每人都得吃，一个人也不许逃避。大家没法，只好啜了一小口，十个人轮遍了，一小罐汤还剩下大半。一个年轻战士被革命队伍这种患难与共的革命感情感动得低声哭了起来。杨靖宇发现了，就笑着说：

“同志们，你们看，这火烧得多旺啊！革命就象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即使我们可能牺牲，我们生命的火焰，也能够照亮黑夜，烧红了天。你们说，做一个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么？”

十个战士紧握着枪，激动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坚决战斗到最后
息！”

二月十八日，敌人又围上来了，四、五架敌机在头上疯狂扫射，突围时牺牲了三个同
志。七个人坐在林中一棵倒木上歇脚。四围山头上都是敌人，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大家虽
然冻得全身发麻，也不能生火，围着杨靖宇坐着。杨靖宇借着微弱的雪光，把七个人的脸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深情地说：

“同志们，我们要分手了。”

战士们一听这话，就哭了。一个战士说：“我们活着在一起战斗，死也要死在一块。”

杨靖宇说：“那为什么呢？分开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死在一块有什么意义呢？”

他要警卫员带领三个战士，到濛江城北去找政委，他自己带两个战士继续南进——尽
管环境这样险恶，他还是充满信心地要找政治部主任部署粉碎敌人的进攻。

杨靖宇在一片小纸头上写了几句话，交给就要分手的四个战士。他拍拍他们的肩头
说：“好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要记住，一个革命战士，至死不泄密，至死不投降！”

四个战士都泪流满面，知道非走不可了。警卫员拿出剩下的半块苞米饼，交给留在杨
靖宇身边的一个战士说：“找机会煮给司令吃。”

杨靖宇目送着四个战士的背影消失在森林深处，然后自己带了两个战士向南走去。

十九日，杨靖宇派两个战士到附近去找老乡买一点吃的和穿的。他们在山边遇到了一
股日寇的袭击，一个战士当场牺牲，另一个负了重伤，很快也去世了。

现在，只剩下杨靖宇一个人了。在他的伟大生命的最后五天中，他只身一人和上千名
敌人辗转搏斗。他不感到孤独，也不知道恐惧。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可惜的？只有共产主
义理想才是最可珍贵的！他和全国人民在一起，他感到自己强大无敌！

敌人把杨靖宇包围在濛江城南保安村（今靖宇村）名叫三道葳子的山林里。他正在发
着高烧，脸也冻烂了，严重的关节炎折磨着他，两条腿好象木头一样失去了知觉。惊人的
毅力支持着他，他转了几座山头，走不出去，又回到了三道葳子。

这已是二月二十三日。这天下午，杨靖宇遇到了打柴的农民，他拿出钱来向农民买粮
食和棉衣。他已经整整五天没有吃一点食物，靠着勉强吞咽下去的从身上撕下的棉花支
撑了他战斗的五天！

农民听说他是抗联战士，流着泪答应马上回村去拿。可是，农民走后不久，大队鬼子
和伪军扑上了三道葳子，狂叫着向杨靖宇冲来。

杨靖宇两手端着两支手枪，伏在大树后向敌人射击。

敌人喊着：“投降吧！你跑不了啦！”“过来吧，过来给你当大官。”

但是，回答敌人的只是子弹、子弹、仇恨的子弹。成批的敌人倒了下去。

敌人的火力更猛，把树木也烧着了，火焰包围了杨靖宇。他的右腕受了伤，就用左手

继续射击。

又一颗子弹打中了杨靖宇的腰，殷红的鲜血深深渗入雪地，流进祖国亲切的泥土里。杨靖宇打开弹夹，看到里面只剩下三粒子弹。

成群的日寇端着刺刀冲了上来。杨靖宇猛然站起，“呼，呼”，又撩倒两个鬼子。其余的敌人赶紧爬在地下。

现在，杨靖宇的手枪里，只有最后一粒子弹了。他靠着大树站着，深邃的眼光透过烟云浓重的森林上空，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抗战圣地延安，他的心激动起来：毛主席啊，你的伟大光辉，照亮天空，中国革命一定要成功！

他转过身来，遥望苦难深重的中原，那里是他出生和战斗过的故乡。他似乎看到了当年他领导农民起义的古城，城楼上写有“犁”字的大红旗依然在风中飘扬。同志们哪！革命才刚刚开始，你们要继续奋斗啊！

他的眼光长久地停在巍峨的长白山主峰，那是抗联健儿英勇不屈的象征。在它那二百里森林中，战斗着许多亲密的同志，他有多少亲切的话要嘱咐战友们啊！可是，来不及了，日寇又爬过来了，五十米，三十米……

杨靖宇举起了枪，神色自若地对着自己的胸膛。他高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胜利成功万岁！”

“呼！”最后的枪声响了……

伟大的战士倒下了，党的忠贞的儿子杨靖宇倒下了！他热血洒地，壮志烛天。他以生命的火炬，为子孙万代照亮了革命的征途。

杨靖宇牺牲后，残暴的敌人解剖了他的身体，割下他的头到长春去报功。直到一九四八年长春解放后，党花了很大力量，才从一所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他的遗首。事隔八年，他的面容依然那样坚毅不屈；他的嘴微微张着，象是在继续呼喊；他半张开的双眼，终于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灭亡；而那冻伤的脸颊，无声地告诉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岁月！

汪精卫卖国记(中)

史 锋

汪 记 “六 大”

一九三九年六月下旬的一天，愤怒的渤海以汹涌的浪头狠狠咬啮着一艘从日本驶来的船只。坐在船上的汪精卫在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能够当上傀儡王，却不知还要磕多少响头呵！

汪精卫从日本回国后，赶紧一一晋见了日寇驻北平、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又在上海作了一次广播讲话。他在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昏话后，接下来竟连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搞不清了，厚着脸皮问道：“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答案自然是现成的：当汉奸和奴才。这就是汪精卫的“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在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汪精卫又顶着南方八月的烈日，跑到广州，作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拖人下水。可是响应的人实在少，只有玄学鬼张君勱发了一则“通电”，凑了一点热闹。

汪精卫大失所望地回到上海，纠集了一帮汉奸骨干分子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上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要召开“六大”，到哪里去搜罗“代表”呢？正好汪精卫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的，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这时事毕回到香港。汪精卫就要他在回重庆复命时，去拉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急急赶到重庆，只要一见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汪精卫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

“嘻嘻，如果愿意回上海，一定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走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二个人。这些人本来就爱钱如命，自然照收不误，但没有一个人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来入伙。汪精卫到处拉人，难以凑数，他的党羽就趁机拉拢私人，扩充势力。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李圣五（后来当了汪伪政府的教育部长）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带进。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国民党员）当上代表的经过，就是既惊险又出奇的一幕。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饭后，客人某丙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了，某丙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式。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是被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来了。几个人下了车，被引进二门，只见五步一岗，枪都上了刺刀。进了大厅，却意外地看到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被带进另一间屋子，一个满面病容、瘦如骷髅的人出来接见。经过丙的介绍，知道这人就是丁默邨，是汪记国民党在上海市和江苏省两地的头子。丁默邨叫这几个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八月二十八日，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著名的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在会议职员名单中，赫然列着老牌汉奸的名字，引起了一些新汉奸的妒忌。在中午休息时要见汪精卫，周佛海出场代见。有人对周佛海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是羞以为伍的。”周佛海极力劝解说：“他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现在的警卫，都是由他派的。万一因此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由谁负责？”这一说，弄得几个新汉奸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接着，在会上讨论“中央委员”人选，有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嘀嘀咕咕了一阵，进而骚动起来。有个人站起来要发言，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马上围了上去，丁默邨也朝着他弹眼睛，示意要他“识相一点”。吓得这个人站在那里支支吾吾，直打哆嗦。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深怕会议开不下去，就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把局面扭过来。

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神气了，想再给自己涂一点油彩，就在会上说：“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这一说，可就露了馅。日本人虽然并没有坐在座位上，但谁不知道傀儡戏的牵线人总是躲在幕后的。而且就在汪精卫说话前不久，牵线人还曾经露过面。原来日本人发现“大会组织法”中规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要各选代表若干人出席会议，就认为汪精卫无视伪“满洲国”，是大逆不道，派人到会场来责问。奴才们慌忙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好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

汪精卫正在向儿皇帝宝座一步步爬去，谁知轰通一声，从“后院”响起了爆炸声，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高 陶 拆 伙

汪精卫的“后院”，本来就不太平。因为这些汉奸，全是图谋个人私利、不惜出卖灵魂的剥削阶级分子，他们彼此之间总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加上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在日本人面前的对手地位，不断设法拆汪精卫的台。蒋介石不是派特务来暗杀，就是派说客来

游说，更把汪精卫集团内部搞得乱哄哄的。在这一片杂乱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

高宗武是汪精卫投降日寇的一个牵线人。蒋介石要对汪精卫实行拆台政策，就选中了高宗武这一个目标。宋美龄首先派人拉拢高宗武的妻子，要她勾引高宗武离开汪精卫。随后是军统特务跟进，威胁高宗武的妻子说：“如没有高宗武牵线，汪精卫就没有路子当上日本的对头。如果高宗武继续对汪效忠，就要对他不起了。”

正当高宗武心神不定时，发生了一场关于分配伪政权权位的争吵。高宗武自恃勾结日本主子有功，一心想当外交部长，而汪精卫却坚持要让他的裙带亲褚民谊来当，只允许高宗武当副部长。高宗武当然不满，向陶希圣发泄。陶希圣呢，虽然当上了宣传部长，但副部长是“公馆派”的林柏生，林柏生倚仗“公馆派”头子、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作靠山，根本不卖陶希圣的账，陶希圣因而也对汪精卫不满。至于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对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陈璧君、陈春圃的“公馆派”更是明争暗斗，积怨很深。

正在这种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陶希圣又摸到了一个底，即日方认为汪精卫集团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争取蒋介石集团。看苗头跟蒋比跟汪来得有利。于是陶希圣串通高宗武，经过一番安排，两人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滑脚溜走，秘密离开上海。一月二十一日，高、陶在香港公开宣布与汪精卫拆伙，重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并揭露了他们秘密拍摄和抄录的一份日、汪密约，向汪精卫放了一炮。

这个卖国密约，名曰《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寇看准了汪精卫急于上台的时机要他签订的。其主要内容是：东北割让给日本，将蒙疆（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公布了这个密约，急得汪精卫一伙黄汗直淋。周佛海在日记里咬牙切齿地写道：“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

为了掩盖真相，陈璧君急忙叫陈春圃以汪精卫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在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说什么“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之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段纪录”，不但一口赖账，还无耻地吹起牛来：“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拼命往脸上擦粉。但是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在同一天的社评中，却露出了马脚，承认“和议的结果为损失”，而又以“只要屈辱而不至于屈服，损失的程不致于断送复兴之基础，和了还是比战到灭亡要好”等进行诡辩。一个声明，一篇社评，相互打耳光，越加显出这帮卖国贼因为掩藏不住尾巴，已经乱了套了。

日、汪密约被揭露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加以“谴责”，乘机打击汪精卫集团。汪精卫集团的这一个阴冷的冬天，日子实在难熬啊！

傀儡登基

正当汪精卫集团唉声叹气、处境尴尬的时候，日本主子就加紧替它打气。影佐祯昭对北平、南京两个汉奸政府头子王克敏、梁鸿志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同意合并于即将孵化出来的汪伪政府。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影佐的导演下，三个傀儡在青岛举行“会谈”，分配“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席位和所谓“新中央政府”的人选。并约定：先由两个老汉奸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汪精卫的“和平”主张，同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然后，选择三月二十六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伪政府。

结束了青岛的“分赃”会议后，汪精卫加快了筹备傀儡政权的步伐，于二月十二日邀请所谓“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举行上海会谈，以便给自己的上台披上一件“民意”的美丽外衣。

请看这些参加“会谈”的人，是一批什么样的货色哟！

所谓“各合法政党的领袖”，一个是号称“社会民主党党魁”的江亢虎，可是这个“党”在这时连一名党员也没有，只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上有这么一位江“博士”的大名，于是就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作宝贝，特地搜罗了来，给了汪精卫；另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玄学鬼张君勱的帐前小校诸青来，他们的党叫做国家社会党；还有一个是青年党的二等角色赵毓松，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还在重庆，让赵毓松在汪精卫手下开设了这家“分店”。汪精卫为了装点“多党政治”的门面，每月都拨给它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它们摇旗呐喊。

至于所谓“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既有“洪宪皇帝”的驸马，又有“两广总督”的公子；既有封建遗少、保皇余党，又有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就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展览会，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

会谈结束，汪精卫窜到南京，去召开“中央政治会议”。

南京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汪精卫不是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吗，现在一别三年，总要先去谒陵吧。可是且慢！先总理固然是招牌，丢不得，——不然为什么这次成立傀儡政府不叫“成立”，偏要叫做“还都”呢——但是，活主子是靠山，更加不能怠慢。于是，汪精卫先在十八日拜见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十九日才到中山陵去溜了一转。汪精卫的奴才相也表演得足够了！

可是，尽管奴才十分卖力，主子却又出来煞风景了。原来日寇背着汪精卫集团，同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圆桌预备会议”，诱蒋投降。

为了实现蒋汪合流，日寇又命令汪精卫傀儡政府推迟登场。三月十九日，由犬养健通知周佛海：“与渝方某要人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四月十五。”

周佛海大为意外。一方面由于日本人瞒着汪精卫集团与重庆勾结，怀疑日本支持汪精卫集团的诚意；另一方面，又深怕如果把原定三月二十六日登台的计划拖到四月十五

日，会使“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并且“此间必崩溃”。因此，周佛海急忙邀影佐面谈，乞求关于汪伪政府开张的日期“最迟不能过三月三十一日”。影佐表示同意，并决定原定三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如期举行。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汪精卫心思沉重地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了所谓“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政府名称及国旗标志，最后排定了各院部名单。然而，汪精卫仍旧悬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因为一切应当办的手续虽然都已办好，但只要日本主子轻轻一摇头，这些庄严的礼仪就统统会变成一场滑稽的游戏。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投降斗争的热潮，迫使蒋介石不敢马上公开投降，使日、蒋谈判拖延了下来。而麇集在南京的这帮汉奸当中，则因为怕被日本人抛弃而开始另谋出路，想改换门庭去投奔蒋介石。汪精卫集团风雨飘摇。日本帝国主义害怕夜长梦多，苦心经营的傀儡戏开不了场，于是通知汪精卫：可以袍笏登台了。

汪精卫原想在四月一日上台。但有人提醒说，这一天是外国的“愚人节”，恐怕落下笑柄，因而决定提前两天。这真是做贼心虚！实际上，在帝国主义枪口下拼凑出来的“政府”，岂只愚蠢之极，而且无耻透顶，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同声唾骂，哪里是另拣一个日子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呢？！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日寇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汪伪傀儡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由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不久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天上午九时，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场面十分凄凉。大门口的旗杆上，扯起汪伪政府的“国旗”：在“青天白日”旗上面，附加着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六个黑字的黄色三角形布片。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貽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登上了儿皇帝的宝座，心里好不得意！当天中午，一群日本主子和汉奸奴才，出了“国府大礼堂”，涌往“汪公馆”赴宴。宾客到齐，汪精卫指着桌上已经筛好的酒谄媚地说：“这酒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郎先生预先送来的。今天请大家为酬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

不料，有人把酒送到嘴边一尝，叫道：“酸的，这酒变质了！”

这一声叫，使群丑们想起，不久前在伪“维新政府”的一次宴会上，发生过毒死人的事件。这伙怕死鬼慌忙将已经含在口中的酸酒喷吐出来。更有人恐惧地大叫：“不好了，怕是毒酒！”有的甚至吓得失手把酒杯落在地上。

当着日本主子的面，出现这种乱糟糟的情景，汪精卫感到非常难堪。他尴尬地苦笑着，连连劝道：“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诸位，请！”这个汉奸卖国贼，把认贼作父当作无上的“荣耀”，为了表示忠于主子，那怕主子赐的是毒酒，也要学着宋江，把它吞下肚去！于是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一手使其余的汉奸自叹不如，并因而博得在场的日寇陆军

报道部长谷荻那雄华的夸奖。

汪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可是它实际管辖的地区，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一部分，南京、上海两市，以及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的少数地区。地方很小，主权更是谈不上。它的太上皇、日寇设立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着汪伪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权。“最高军事顾问”由影佐祯昭充任，“梅机关”的其他主要人员也转而为“最高军事顾问部”的顾问。所有重要决策性的问题，都由“最高军事顾问部”提出，交由汪伪政府执行。如果事先不得到“最高军事顾问部”同意，即使汪伪政府已作出了决定，也是无效的。特别是影佐祯昭，象影子一样日夜罩在汪精卫头上，完全支配着汪精卫的一切行动。

日寇对汪伪的武装力量，控制得更是十分严密。汪伪的所谓“和平军”，有的是原南京“维新政府”任援道指挥的汉奸军，有的是蒋介石部队以“曲线救国”名义投奔过来的伪军。在这些伪军中，日寇都派有“顾问”进行监视，直接指挥。因此，尽管汪精卫拥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也只是徒有虚名。至于汪伪的所谓“海军”，仅有小炮舰三艘；所谓“空军”，只有几架教练机而已。

在日寇一手扶植、操纵下的汪伪傀儡政权，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它一成立，就受到全国抗日军民的一致声讨。四月十五日，我八路军、新四军发布讨汪救国通电，对于汪精卫卖国集团的“倾复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的滔天罪恶，狠狠地进行了斥责。上海学生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实行总罢课，举着“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冲破巡捕房的干涉，到租界各马路上散发讨汪传单。

各地的讨汪声浪震天撼地，把汪精卫为感谢日本主子的“提携”而作的阿谀谄媚的对日广播声完全淹没了。

奴才难当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更发现日本主子喜怒无常，很难侍候。汪精卫这个傀儡王，明明是日本人一手扶起来的，但扶上台后，日寇却又不马上承认，而提出先要把过去汪精卫以私人名义签订的卖国条约用伪“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再签订一张正式契约，以便更牢固地确立主奴的地位。

订个卖国条约，对汪精卫来说已是“训练有素”的了。日本政府派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作为“祝贺国民政府还都”的特派大使，于四月二十三日窜到南京，同汪精卫举行“调整邦交会议”，到八月底，炮制出了一个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比之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中国的主权统统拍卖光了，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

但条约搞出来后，日本主子还是不着急要汪精卫签字。因为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同重庆国民党政府搞“全面和平”，而捧出汪伪政府只是从侧面推进这项工作的一种策略，一个阶段而已。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一直在进行，从六月份开始的新一轮日、蒋谈判又在澳门举行。在日本政府看来，这比承认汪精卫政权更为重要。九月，谈判中断，日寇

又让德国居中调停，促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企图实现汪、蒋两个政权的合流。

因此，日、汪谈判结束之后，日方一不叫汪精卫正式签字，二不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这种姿态，是有意做给蒋介石看的。一直拖了近三个月，日、蒋“和谈”暂告中断，日本政府才决定先承认汪伪政权，签订日、汪条约，等有机会再对蒋介石进行诱降。

十一月二十八日，南京汪记“中政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以便让他“名正言顺”地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二十九日，汪精卫就职。三十日，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这天一大早，汪精卫身穿大礼服，系着灰色条纹领带，提前来到会场，恭恭敬敬地等候主子光临。等了很久，阿部信行才姗姗而来。九时正，签字仪式开始，聚光灯惨白的光束直打在阿部和汪精卫的脸上。满面杀气的阿部和满脸死灰的汪精卫分别在条约上签了字。

同日，汪精卫又同日本的阿部、伪“满洲国”的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

在汪精卫完成了上述各项卖国手续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了一则“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精卫读到这份“公报”，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感激主子终于正式恩赏他当了奴才总管。

汪精卫对主子感激不尽，但那些汉奸奴才同强凶霸道、无恶不作的日本主子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他们在日本主子面前忍气吞声，背地里不断向汉奸头子诉苦告状。汪精卫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让喽罗们死心塌地跟着他卖国，就拚命宣扬奴才哲学。

有一次，有人把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骚。汪精卫听了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不要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要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那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套奴才哲学，感到无话可说。汪精卫提高调门继续鼓吹他的卖国谬论：“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坐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将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谁说汪精卫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傀儡？他算的这笔账就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因此，我汪精卫没有什么可气的，我的境遇不是比蒋介石还好一些吗？——这套奴才哲学真是臭不可闻！

但是，他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的日记，就是表明他当时烦闷心境的一扇窗子：“日夕徬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去。”

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作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莫、而又死不回头的反动思想情绪：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了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他是决心要把残余的可耻生命当作最后一笔赌本，来孤注一掷的了。

东 京 “谢 恩”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暮色笼罩着黄浦江。停泊在江边码头的日本八幡丸海轮，灯火辉煌。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和兴亚院（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机构，用以集中控制中国占领区，其总裁由日本内阁总理兼任）四个机关正在船上联合举行公宴，为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访日的汪精卫饯行。

汪精卫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表示更加死心塌地效忠日寇；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而日本方面，也因正在策动太平洋战争，需要在中国占领区安置好看家狗，想通过汪精卫的访日，“强化”汪伪政府，使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因此对于汪精卫的赴日，故意铺张。

七时半，宾主就座。日本公使堀内干城起立致欢送词，他夸奖汪精卫“从事和平（按：“和平”应读作“投降”）运动，备极辛劳，而其对和平的精神，尤为中日人士所钦佩。”堀内带头举起高脚酒杯，提议为祝贺“汪主席”的成功干杯。

一向听惯了主子的叱声、看惯了日本人白眼的汪精卫，听到这番话，一时受宠若惊，赶紧立起身来，垂手敛眉，致答词说：“日本所处之地位，实为太平洋中保护东亚之一座万里长城。友邦人士，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物力，筑此长城”，而他汪精卫能在这座“长城”的“保护”下过日子，已经心满意足，“心中不胜欣悦”。这一晚，主子假意奉承，奴才真心感恩，一直闹到十时半才散。

翌日上午十一时，八幡丸驶离码头，在黄浦江浊浪中东进。汪精卫穿着礼服，到特别餐室吃罢午饭，回到他所住的特等卧舱，随员送来一份东京拍来的电报。汪精卫急忙展开一看，原来是日方告诉他，日皇决定作为皇室宾客来接待他，指定霞关离宫做他的临时行辕，并将于十八日在宫中接见他。汪精卫对于这种接待规格，已是喜出望外，呆望着窗外，久久地出神，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日本。

汪精卫等在十七日上午抵东京车站。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精卫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深感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龙恩”的话来了。

可是，汪精卫太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了。几年前，“满洲皇帝”溥仪来朝见，日皇曾亲到车站迎接这个“龙子龙孙”；而这次汪精卫到日本，日皇却大大咧咧地安坐在深宫里，等着汪精卫来登门叩见。可见，在日本主子眼里，他不过是个二、三等的伙计。

尽管如此，汪精卫对于主子给了面子，还是感激涕零，一再表示要“追随日本”，“无稍变异”。尤其当他听到主子称赞他“半生来冒几多的艰险，不顾一切迫害，……爱日本爱东亚”等语时，这个不爱中国爱东洋的卖国贼得意忘形地说：“余今次受日本朝野之激励，勇气百倍。”他立誓要“勇气百倍”地进一步协助主子灭亡中国了。

为了进一步表示感激，汪精卫于六月二十日到鹤见总持寺，在寺院南边的梅树林中竖了一块碑，并亲笔题为“日本同志援助中国革命追念碑”。把日本法西斯视为“同志”，把屠杀中国人民称作“援助中国革命”，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反动无耻的么？！

六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坐船离开日本回国。在归途中，他的心依然沉浸在对主子的无限感激之中，于是拿起笔来，写下了“访日感想”：

“担负第一道防线的人（按：指日本帝国主义者），回过头来看见后方（按：指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这样的不争气，你叫他怎的不怕，怎的不恨。”

“日本之目的，不在中国之灭亡，而在中国之兴隆，俾中国能与日本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那么等于长兄虽然打了兄弟，但并不是要将他打死，仍然要和他同心协力地复兴家道。”

“相亲相爱是共存共荣的根，共存共荣是相亲相爱的花。”

够了，够了！凶恶的侵略者成了“担负第一道防线的人”，“等于长兄”，而被侵略者却是“后方”和“兄弟”，纵然挨了打，沦亡了大半个国土，也还要同侵略者“同心协力”“相亲相爱”，真是满纸汉奸话，一摊臭狗屎！

在汪精卫回到南京的当天，东京宣布扔给走狗几块肉骨头：“帝国政府答应国民政府之希望，决定立刻供给借款三亿日元。”汪精卫当然又要“激动”一番，猜猜地隔着大海向主子发出“曷胜感激，终身不忘”之类的吠声。

但是大海咆哮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拍天的巨浪向敌人涌来。英勇的新四军游击健儿直逼石头城下。汪伪政权如同坐在一座吼声隆隆的活火山，惊恐万状，于是把自己紧紧绑在日寇的战车上。

中国人民的抗日反汪斗争翻开了更加激烈、更加雄壮的一页！

（未完·待续）

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

——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

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

东风，强劲的东风，卷起万顷巨浪；海浪，奔腾的海浪，洗却千年尘埃。

这是人们来到杭州湾口的山阳所看到的壮丽景色，也是人们接触了这里的社会新风尚之后所得到的深刻印象。

要问这种印象是怎么来的，就从一些平凡事情发生的不平凡变化说起吧！

百货店门口的启示

公共汽车沿着波光粼粼的龙泉港开到山阳镇，从车上下来，走过水泥桥，迎面就是山阳镇百货商店。商店里，人群簇拥，货架上，琳琅满目。这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快过春节了，人们喜气洋洋地赶来挑选各自喜爱的物品。

在棉布门市部的柜台旁，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妈妈和她的年轻儿子，挤在人丛中，精心挑选着衣料。小伙子前些日子刚订了婚，母子俩正忙着办彩礼。老妈妈已经给没过门的媳妇买了三斤毛线，一条毛涤裤料，两件的确凉衬衣，又给儿子买了一条毛涤裤子。小伙子还想给未婚妻买件毛涤上衣料，母亲嫌贵，主张买花呢的。母子俩发生了争执。小伙子说：“花呢不要，还是毛涤挺刮。”母亲说：“花呢也拿得出手啦，不要光图好看。你不想想，种田人呀，穿得挺来兮做啥！”

一会儿，母子俩一先一后出了店门。小伙子两手抱着一包包货物，眉开眼笑；老妈妈跟在后面，眼含泪水。只听见她边走边抱怨：“你真是蜜糖灌大的，穿了花呢还不称心！我结婚辰光，连件洋布衫也穿不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百货店门口的情景，被在场的一位公社领导同志看到了。公社党委会上，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之后，做了一个决定：发动党员、团员、民兵和广大群众评论这件事。

夜深了，波涛拍击着海堤的响声，有节奏地从远方传来。在前进大队办公室，团员和青年民兵正热烈地讨论着百货店门口发生的那件事。

解放前，这里的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哪还有钱搞什么彩礼？搞彩礼的，尽是那些地主老财们。他们娶个媳妇，要送钱，送金戒子、金耳环、金手镯。嫁个女儿，要送嫁妆，光被头就有十几条、几十条，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東西。青年们气愤地说：“这是把婚姻关系当成了金钱关系，把妇女变成了商品。”

就在不久以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邻近大队的一个男青年，同一个女青年订了婚。女方提出要一台缝纫机作彩礼。过了三个月，这位男青年总算搞到了一台，立刻与弟弟兴冲冲地抬了去。可是，到了女家，那个女青年却冷冷地说：“拖得这么久，晚了。我们就算没相识过吧。”原来，她已经收下了另外一份更厚的彩礼。

前进大队的青年们在讨论中谈起这件事，对那种把自己当作商品，谁出高价就卖给谁的旧思想，进行了批判。大队团支部书记、女青年周全宝当场表示：要坚决破除收彩礼的旧俗，带头把彩礼退回婆家去。其他青年也纷纷表示，要坚决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

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战斗在全公社打响了。

中午，在生产队的场地上，围满了男女老少，大队文艺宣传队正在表演他们刚创作的节目《退彩礼》。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唱道：“送彩礼，办酒席，都是旧社会留下的坏风气，既费心思又费钱，革命青年一脚踢。”这个女青年就是前一天亲自到婆家退了彩礼的小张。

小张初向她母亲提出退彩礼时，她妈妈想不通，不同意，说：“人家一片好心送来的，怎么能退呢？”小张耐心地给妈妈讲：“旧社会送彩礼，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新社会男女平等，我们革命青年是同志，要带头破这一套。”最后，妈妈还是说：“你带头退不好，等等再说吧。”

当天晚上，生产队政治队长找了几位订婚青年的家长一道学习，小张的妈妈也去了。有几位老人回想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那时劳动人民结婚，就是一张红纸，写上两人的生辰八字，哪有什么彩礼？一位老妈妈说：“一份彩礼，要花好几百块钱。多少做爷娘的在为办彩礼操心奔忙啊！有的借了债，有的变卖了家产，最后，还不是害了一对小夫妻！”老姐妹们的话，使小张的母亲想起了自己悲惨的家史，心里直翻腾。学习结束后，她一进家门，就大声对女儿说：“退，把彩礼退掉！明天我陪你一道去。”

那些日子，在山阳公社，到处热气腾腾。人们举着红旗，敲着锣鼓，一个个订了婚的女青年，把彩礼退回去。前进大队三十七个女青年，在短短的两天内，就把彩礼全部退了。一个星期内，全公社有一千零五十六对青年退了彩礼。子女说服父母，父母教育子女，男女双方互相支持，各个大队都出现了许多这样动人的事迹。

春苗出土迎朝阳。扫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的革命青年们，用自己火红的青春，朝气蓬勃地创造着新的生活。

今天的山阳公社绝大多数青年在结婚的时候，都不送嫁妆，而送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文件，送锄头、镰刀和扁担。结婚的仪式也完全变了。过去是船送轿子抬，现在是姑娘自己走着来。过去是办喜酒，撒喜钱，现在是生产队开个欢迎会，先由队长介绍生产队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情况，鼓励新婚夫妇努力学习，做抓革命、促生产的带头人。过去，新娘子

至少一个多星期不出工，现在，有的当天就下田劳动，当晚就参加政治夜校学习。一九七五年，全公社共有七十多对青年按照新仪式结婚，贫下中农都高兴地说：“结婚讲政治，讲革命，这种新法，最合我们的心意。”

一年过去了。眼下，又一个春节来临了。在新的一年里，这股社会主义的新风，将把山阳之春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千分之七点〇九

东海推出一轮红日。欢歌、笑语，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送进幼儿园，把一群英姿飒爽的妇女送进田野。前进大队新的一天战斗开始了。

在这里，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没有一对夫妻生过第三个孩子；

在这里，青年女社员生了第一胎后，都准备间隔五年再生第二胎；

在这里，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这类旧思想、旧意识逐步失去了市场，实行计划生育已经蔚然成风。全队人口增长率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十一点四，一九七五年下降到千分之七点〇九。

要了解这里的贫下中农为什么能下那么大的决心，来结束生育问题上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去。

解放前，这里叫倪家村，是一个出名的穷海滩。在地主、富农、国民党、土匪的压榨下，在风、虫、水、旱等灾害的袭击下，这里贫下中农的祖祖辈辈，“脚踩芦柴塘，口喝混泥汤，种煞铁沙板，住煞破草房。”在那种社会制度下，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生活没有保障，许多人指望早生儿子、多生儿子，老了好有个依靠。但无情的现实是，孩子生得越多，生得越密，他们的苦难也就越深重。

第四生产队六十一岁的张端宝老妈妈，一共生过十个孩子。她十七岁和贫农江阿火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鬼子闯进了倪家村，又烧又杀，她的丈夫被开膛破腹，丢进河塘，同时惨遭杀害的还有四十八个阶级兄弟姐妹。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怎能养得活两个孩子呢？她强咽下辛酸的眼泪，忍着刀绞般的心疼，把五岁的儿子和仅仅十个月的女儿，都送给了人家。一九三八年，她又和穷得叮当响的周阿奎结了婚。夫妻俩租了地主十二亩地，起早摸黑，一年做到头，缴了租子，只能勉强糊口。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接着，又添了第二、第三个孩子。添一个人，多一张嘴。可是，怨孩子多，孩子偏偏来得密，隔一年生一个。每当怀孕的时候，她常常急得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肚子，扛磨盘，干重活，想用这些办法把胎儿打掉。那时候，多生一个孩子就要多受一份罪，不仅大人日子难过，孩子也痛苦。

在旧社会，有哪一个多子女的穷苦母亲不为生育问题而苦恼呢？第八生产队五十七岁的周菊宝老妈妈生过十一个孩子。解放前，她家没有一寸土地，全靠丈夫挑担做小生意糊口。孩子病了，家里没有柴，没有米，哪有钱请医抓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七岁的太儿子，三岁的女儿活活病死，三个月的小儿子活活饿死，还有两个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那时候，

她总是怨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人，要活受这份罪。今天，她已经明白了，过去之所以受罪，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的光辉照亮了苦难的倪家村。从此，贫下中农翻身作了主人。但是，人们对于生孩子仍然没有好好计划，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不利。

第二生产队社员杨忠林，孩子生得早、生得密、生得多，隔一年生一个，一连生了三个。小夫妻俩既要忙生产，又要带孩子，整天忙得团团转。晚上，队里要开会学习，他们想去参加，可是，三个孩子“大的叫，老二闹，小的不睡觉”，脱不开身。尽管生产队照顾他们，特意安排一些工分较高的活给他们干，但到了年终分红，还是两手空空，要不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家早就背上一身债了。夫妻俩常常嘀咕：早知这样，那时候真应该生得晚一点，少一点。

但是，那时候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大队党支部的重视。有人就说：这是妇女主任的事，我们管个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支部反复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对多子女的困难户进行了调查，认识到生孩子不光是个人家庭问题，而且是关系着国家和革命的大事。多生孩子，大人就不能好好抓革命、促生产；孩子照顾不过来，教育不好，就当不好接班人。计划生育，不仅妇女主任要抓，党支部全体成员都应当抓，并且要发动社员群众一起来抓。

过去，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作怪，妇女老是被人瞧不起，在评工分的时候，也要低一等，男的拿十分，女的最多只能拿八分。有的社员生了男孩非常高兴，生了女孩就扫兴地说：“唉！生了个‘八分的’！”有的社员生了三个或四个女孩，还一定要再生一个男孩，结果不仅自己经济紧张，而且加重了国家和集体的负担。现在，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广大社员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妇女无用”的反动谬论，坚持男女同工同酬，有力地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大队支部副书记老倪和民兵连长小陆，都是只生了两个女孩，就带头做了绝育手术。

现在，在前进大队，青年成了计划生育的积极带头人，老人成了计划生育的热情宣传者。由于生育有了计划，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每当晚霞染红天边的时候，社员们从幼儿园领回孩子，欢歌笑语从一家家的门窗飞出，和东海的春潮声交织在一起。

酒肉是怎样变成酱菜的？

白墙、红瓦，又是白墙、红瓦，一条明净的小河，辉映着南北两户人家。

南岸，是东方大队第四生产队贫农社员蒋春方的家。他家的房子是在大队新五匠组成立前盖的，盖的是三间草屋。那时，许多人都说：“请五匠师傅造新屋，你招待得越好，他们干得越快、越精心。”还有人说：“人生三件大事，盖房子、讨娘子、生儿子，都应该好好热闹热闹，可千万别小气。”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蒋春方夫妇想方设法，东借西凑，置办酒席。三间草屋，盖了三天，五十斤一坛的酒，吃掉了六坛；猪，吃掉了四头；粮，吃掉了五

六百斤。连同造房材料和人工，花了一千三百多元。

北岸，是同一生产队贫农社员马培根的家。他家的房子，是请大队新五匠组盖的。盖屋时，新五匠组的老师傅们，不吃他家一口饭，不喝他家一杯酒，并再三劝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要花钱忙吃喝。结果，造了三间两厢瓦屋，把造房材料和人工算在里面，总共只花了一千二百多元。

前不久，蒋春方家请新五匠组把原来的三间草屋翻盖成瓦房。这次，买一千八百块红瓦，花了二百五十二元；用了五个人工，每个人工一元八角，花了九元。此外，就没再花一分钱。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显著的变化！东方大队新五匠组的老师傅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勇于打破陈规旧俗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赞扬。

“做百家活，吃百家饭。”这本来是泥木工的老规矩。在砌房盖屋时，主人总要办起丰盛的酒宴，招待泥木工和来帮忙的人。办酒的和吃酒的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东方大队党支部和新五匠组的老师傅们却不这样看。

这事，要从一九六九年底东方大队新五匠组成立时说起。

当时，有许多事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

蒋春方家盖屋办了酒，背了债，由生活比较宽裕变成了缺钱、缺粮、缺柴的“三缺户”。经济上的困难使得他们夫妻两人心事重重，互相埋怨，生产也没劲头。

大队里，好多贫下中农迫切需要翻盖房屋，建筑材料也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办酒的钱往往比买材料的还要多，一时筹不起，一拖就是好几年，动不了工。

党支部认真讨论了这些问题，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贫下中农过去居住条件很差，解放以来，靠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才有了条件翻盖新屋。但是，“做百家活，吃百家饭”这个陈规陋习，给贫下中农造成了新的困难。党支部回顾了一九六四年成立五匠组，后来又从集体倒退到单干的教训，感到这个问题非抓不可。统一了认识，支委会便决定，深入发动广大社员和五匠师傅，坚决破除这千年旧俗，做到造屋不请酒饭，五匠伙食自理。

但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天，五匠组的副组长老张带了两个木工师傅去新江七队干活。去的时候，带了点鱼，打算自己做饭。但好客的主人早备下了酒饭，硬拉他们去吃。老张想：“这又不是我们要着吃的，人家那么热情，吃点也不会有啥关系。”心一动，三个人便一起吃开了。党支部听说后，立即同他们办了学习班，讨论吃了对不对？吃了怎么办？学习班一连办了三天。第一天，老张没有想通；第二天，党支部请了老贫农来作回忆对比，请蒋春方分析了吃“百家饭”的危害，给了老张和五匠组其他成员以很大的触动；第三天，他们真正想通了。老张带领组里的成员，敲锣打鼓地赶到新江七队，把伙食费补送了去。

在这之后，党支部又对五匠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讲路线，讲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崭新的风尚在五匠组渐渐扎下了根。在本大队做活，他们回家吃饭；去其他大队和其他公社，他们就带了米自己烧饭烧菜，或者在就近食堂里吃。老张成了破旧俗、立新风的

积极分子。

一次，老张带着四个木工去乍浦，给一家造房子。他们自己买了青菜，请主人代烧。吃饭了，桌上除了他们的青菜外，还摆满了热炒、冷盆。主人把他们和当地的五匠拉到席上，殷勤地给每人斟满了香喷喷的酒。可是，你看老张他们，酒杯移到了一边；肉，不吃一块；鱼，不吃一口；冷盆、热炒，碰也不碰。一顿饭，从头到尾，吃的是自己带的青菜，一连四天，都是这样。带来的青菜吃光了，他们就赶到乍浦镇上买酱菜。他们这种酒肉不吃吃酱菜的精神，教育了許多人。

对新五匠组的可贵行动，绝大多数群众打心眼里赞成。但是，也有些人将信将疑，担心不办酒会造成工效低、质量差。也有人觉得，盖房子是件大事，不办点酒，不请一请客，情理上说不过去。有时，儿子相信了，做父亲的还是怀疑；丈夫相信了，妻子总不放心；一个坚持不办，一个硬是要办，往往吵得不可开交。还有少数思想落后的人，对新五匠的行动不理解，说他们是“假积极”，“出风头”。

听了一些流言蜚语，新五匠组的有些师傅感到委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他们对破除“吃百家饭”这千年旧俗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深有体会地说，列宁说得多么深刻啊，“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明明拿了工钱，在生产队里记了工分，还要挖空心思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不正是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吗？自己多捞一点，贫下中农却加重了负担，这就是往回头路上跑！他们豪迈地说：“有人说我们是假积极，出风头。我们就是要积极地大吹社会主义的新风，为破除旧的习惯势力积极地打头阵。”

他们在完成任务中，工效高，质量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逐渐打消了一些群众的思想顾虑。遇到有些人还想摆酒请客，他们就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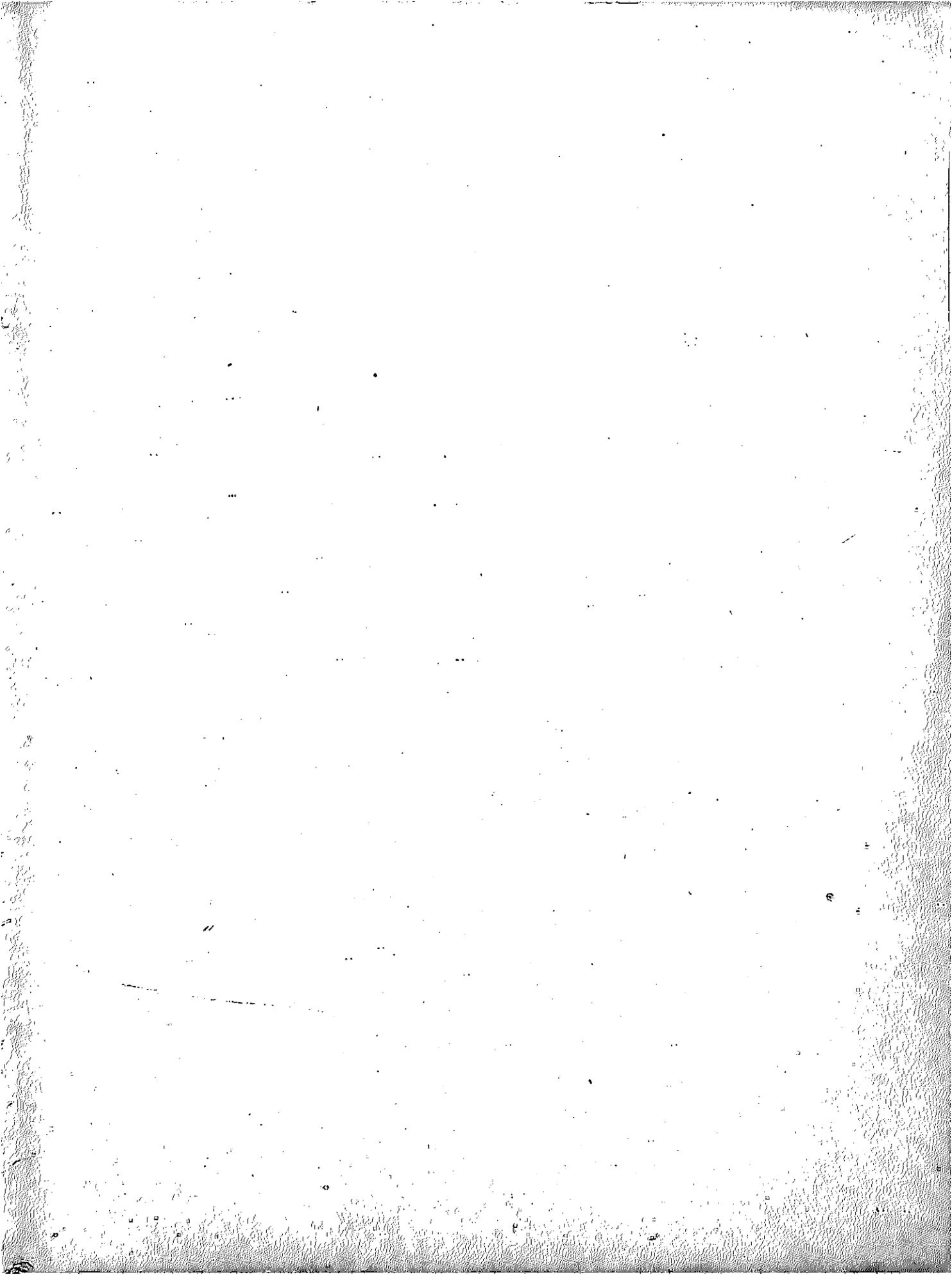
新五匠组在给马培根家盖屋时，尽管事先再三叮嘱过他不要搞什么，但老马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动工那天，从长征大队和金卫公社联丰大队远道赶来的亲友，也纷纷送来了酒肉，当作贺礼。老师傅们一到他家，见到那副架势，就知道老马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便不忙动工，和大队干部一起，同老马全家办了个短短的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新五匠组首先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这要怪我们，没有把宣传工作做好。”当天，老马一家和大队的同志一起，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赶到长征大队和金卫公社联丰大队，把酒肉等礼物退还给亲友家。

新屋盖好后，老马抚摸着雪白的墙壁，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激动得热泪盈眶，逢人便说：“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来的啊！”

一花报春百花开。东方大队新五匠的革命行动，在公社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山阳公社各大队的五匠组，都掀起了学东方、找差距的热潮，破除了“干百家活，吃百家饭”的旧习俗，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共产主义新风普遍得到了发扬。

(未完·待续)



◆
一 九 七 六 年

◆
第 一 期

◆
总 第 二 十 九 期
◆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代号: 4-102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 0.25元